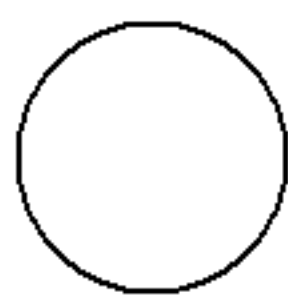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7-8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七、八期合刊 ★

目 录

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 薛暮桥 (1)

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 陈华癸 (10)

深入生活, 提高音乐创作质量 马可 (19)

谈落实 唐平铸 (25)

平凡工作与远大抱负 苗作斌 (28)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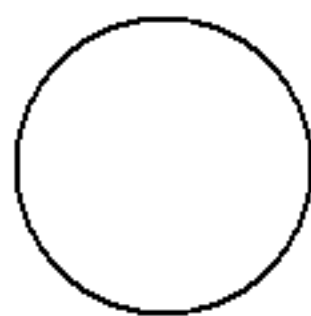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31)

☆ 四月十六日出版 ☆



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

薛暮桥



价格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价值规律通过价格的变动，自发地调节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在那里，价格的涨落像“寒暑表”一样，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情况的各种变化，它向资本家指示生产发展和商品流动的方向，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通过国家计划来决定的。商品的价格，也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但是，国家在决定商品价格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慎重地考虑价值规律所能起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价值规律的要求，来制订正确的价格政策，以促进生产发展，便利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价格政策是属于主观性质的东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制订它，修改它；价值规律是属于客观性质的东西，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在制订价格政策的时候，必须对价值规律进行认真的研究。

决定价格的客观因素

在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里，人们在规定商品的价格时，不论是否认识到价值规律，客观上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影响。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决定价格的客观因素，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商品的价格主要决定于它本身的价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形态。商品的价格必须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以保证商品在交换的时候，能够基本上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条规律仍然要起作用。在我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这两种所有制的产品仍然必须采取商品形式来进行交换。国家用工业品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农产品进行等价交换，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保证。不论是不利于国家或者是不利于农业集体经济的不等价交换，都将损害工人或者农民的利益，因而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国家为了保证商品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必须使商品的价格，按照各自的



价值，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例如，国家必须根据各种农产品的价值来规定它们的价格，在各种农产品的价格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使农民愿意根据国家计划和有利条件，生产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国营企业所生产的各种工业品的价格，也必须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等价交换，才能够使各个企业正确地进行经济核算。

二、货币是衡量价值的尺度，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如果发生变化，商品的价格也将跟着发生变化。价格反映商品的价值同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比例，商品的价格，一方面决定于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决定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如果货币贬值，物价就普遍上涨。当市场上流通着金币银币的时候，货币的价值决定于金银的价值。现在，各国市场上流通的是纸币，很多国家的纸币事实上已经同金银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主要决定于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数量。如果货币发行数量增加到远远超过市场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限度，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会同货币的发行数量反比例地下降。这种现象，就是一般所说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计划来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货币发行量和货币流通需要量之间的平衡的主要方法，是保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平衡和财政收支的平衡。当然，上面所说的几种平衡，也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所以，在货币发行量同货币流通需要量出现不平衡现象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国家计划来进行适当的调节。

三、商品的供求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供求平衡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供求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所以，商品的价格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它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供不应求就涨价，供过于求就跌价；价格高于价值的时候，生产这种商品的人就增加，购买这种商品的人就减少；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生产这种商品的人就减少，购买这种商品的人就增加。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这条客观规律的盲目作用，来保持或者恢复商品供求之间的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依靠正确的国家计划来保持商品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仍然是暂时的、相对的。但是，某些重要商品，即使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它们的价格也不一定会发生波动。因为我们的生产资料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分配的，它们的价格可以不受供求规律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资料虽然还是采取商品形式来进行分配的，但是，国家供应的商品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价格，因而它们的价格也可以基本上不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在某些主要的农产品或主要的生活资料供不应求的时候，国家仍然可以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等办法，使它们的价格不致上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价值规律在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在某些场合，国家也可以主动



采取調整价格的办法，来更快地达到供求平衡。在国家向农民购买计划收购以外的农产品的时候，或者在职工同农民、农民同农民之間进行交换的时候，价格基本上是由买卖双方議定的，因而价值規律在这里还要起一定的作用。

我国的市場价格，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的计划价格。计划价格由国家制訂，一般不受一时一地市場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国家在制訂计划价格的时候，除了必須尽可能使商品的价格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以外，还必须考虑商品在全国範圍內和較长时期中的供求状况，适当利用价值規律所能起的作用。例如，国家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某一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来影响这一种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数量；适当提高或者降低某一种消費品的銷售价格，来影响这一种消費品的銷售数量。对于国营企业生产的商品，有时也必须适当調整价格，通过这种办法来达到增产節約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可以通过調整价格的办法，来影响某些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利用这种办法来調节国家、职工、农民之間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或者通过調整价格来保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間的平衡。

在我国，除了国家的计划价格以外，还存在着不是由国家计划規定的集市貿易价格。社会主义統一的国内市場的主体是国家的计划市場，在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經濟，特别是存在着农民家庭副业（包括自留地的农业生产）的条件下，集市貿易仍然是计划市

場的必要补充。计划市場是按照国家的计划价格来进行交易的。集市貿易的价格，基本上由买卖双方自己議定，因此，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价值規律的影响。当某些商品供求不平衡的时候，集市貿易价格背离国家计划价格的現象是会經常发生的。在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保持平衡、国家的计划价格在市場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集市貿易价格稍稍高于或者低于计划价格，这种現象对指导计划收购以外的农副产品的交流，調节某些不能納入国家计划的三类物資的生产和供应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市場商品供不应求，集市貿易价格同计划价格的距离过大，它就会冲击计划市場和计划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计划市場和计划价格的稳定。所以，我們必須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集市貿易价格，使它同计划价格不致发生过大的距离。

制訂价格政策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訂价格政策的时候，应当充分研究价值規律所發揮的作用，并且考虑社会主义建設对价格政策所提出的下列要求：

一、我們的价格政策，首先应当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便利物資交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即符合于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应当使各种商品的价格之間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它們进行交换的时候，能够基本上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应当使每一种商品的价格保持合理的购



销差价、批零差价、城乡差价、地区差价。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应当同它们的质量相适应，做到优质优价，分等论价。这样来制订价格，才能保证各生产单位、经营单位在正常生产和合理经营的条件下，能够收回成本并且得到适当的赢利，从而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社会必要劳动量，就是生产一件商品平均所花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在这种基础上制订的价格，使中等水平的企业能够得到合理的赢利，先进的企业能够得到较多的赢利，落后的企业少得赢利甚至还要亏本。这种价格，有利于鼓励先进企业，鞭策落后企业，督促企业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保证生产的正常发展。如果某些商品的价格订得过低，就有可能影响企业生产这些商品的积极性；如果价格订得过高，就不但会损害使用这种商品的单位或个人的利益，而且会使企业不注意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这两种情况都对国家不利。同样质量的商品，原则上应当只有一种价格。由于各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高低不齐，中小城市有许多种工业品的成本，一般要比大城市高一点。为了保证中小城市的市场供应，在一定时期内，把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适当提高一点，也是可以容许的，但是，提高的幅度一般以不超过合理的地区差价为原则。有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过分落后，或者经营管理不善，以致商品的质量差、成本高，它们要求按照自己的成本来规定商品的价格，这种要求，无论从国家的利益或者当地人民的

利益来看，都是不合理的。

前面已经说过，在制订价格政策的时候，必须慎重地研究各种商品（工业品与农产品、工业品与工业品、农产品与农产品）之间价格的比例关系，尽可能使各个生产部门在生产国家所需要的任何一种商品的时候，都能够收回成本，并且得到适当的赢利。如果某几种商品的价格订得过高，某几种商品的价格订得过低，就有可能影响这些商品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因而不利于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特别是市场供求的平衡。

在制订价格政策的时候，还必须适当安排各种计划价格之间，特别是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消费品的销售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农产品收购价格是消费品销售价格的基础，因为在消费品中，不但粮食、副食品等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决定于它们的收购价格，而且绝大部分轻工业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它们的销售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所以，要稳定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这是物价稳定的最重要的标志），就首先要稳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重工业品是其他企业的生产资料，它们的价格对生产发展和物价稳定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也不宜于轻易变动。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品的价格对冶金工业品的价格，原料、材料工业品的价格对加工工业品的价格也有重大影响，必须统一安排。

同一种商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以及城市价格和乡村价格、产区价格和销区价格之间，必须保



持适当的差额，有些商品，还必须保持适当的季节差价，使经营这些商品的单位能够得到适当的赢利。如果差价过小，就可能使经营单位的商业活动发生困难，影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如果差价过大，就不利于督促经营单位改善经营管理，减少流转环节，降低流转费用，甚至有可能引起私商的投机活动。

二、我们的价格政策，应当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合理调整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工农联盟，并且保证国家得到适当的积累。我们在规定价格政策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到各种商品在生产和流通方面的要求，尽可能符合前面所提出的各项原则。但是，国家在调整各种商品价格的时候，必然要影响到国家和各阶层人民的分配，因而不能不同时考虑物价变动对分配所产生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安定人民生活，必须努力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特别是主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的稳定。当然，由于生产条件经常发生变化，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随时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但是，在调整商品价格的时候，必须有升有降，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物价水平，同时，还要慎重考虑物价变动对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影响。

职工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决定于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决定于物价水平。所以，改善职工生活，既可以采取增加工资的办法，也可以采取降低物价的办法。在我国，一般是采取稳定物价的办法，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来逐步地提高职工

的生活水平。农民的生活水平，主要决定于农业的生产水平，其次，决定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如果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不相应地提高，或者前者提高的幅度比较大，后者提高的幅度比较小，农民的实际收入就会增加。我们对农民的价格政策，是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制订的，它兼顾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如果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曾经存在着剪刀差，那末，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增产的积极性，这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农产品的价格应当无限制地提高，以致发生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反剪刀差。如果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过多，就不得不相应地提高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这样，就不能保持物价的稳定，从而不利于安定职工和农民的生活。

价格政策，除了保证职工和农民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以外，还应当保证国家取得一定的积累。没有积累，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保证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国家的积累，是工人和农民在生产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生产劳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劳动，大体上相当于他们所得的工资；一部分是为社会的劳动，这就是国家的积累。后一部分也就是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除去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和工资以后的剩余部分，大体上相当于企



业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和利润。农民的劳动同样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农民自己所得的劳动报酬，一部分是国家和集体经济的积累。国家的积累一般是通过税金的形式取得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价格的形式取得，就是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订得稍稍低于它的价值，这个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成为国家的积累。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中，可能要扣除一部分国家积累；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中，也可能要加上一部分国家积累。国家从农民方面所取得的积累，绝大部分仍然要通过各种形式用在农民身上，所以，这样的交换，总的来说，仍然是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

当我们在调整物价的时候，还应当考虑到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和财政收支的平衡。我们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会相应地增加货币投放，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提高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就会相应地增加货币回笼，压缩城乡居民的购买力。如果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就会使工商企业减少赢利，甚至发生亏损，从而减少财政收入；如果提高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而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会使工商企业增加赢利，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供应农业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的农业生产资料，其价格的涨落，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收支，影响货币的投放和回笼。当然，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合理安排，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和财政收支的平衡，都应当通过

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来予以保证。但是，在调整物价的时候，也必须慎重考虑到对这几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三、我们的价格政策，应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计划市场，限制和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努力巩固计划价格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防止集市贸易价格过多地脱离计划价格。如果集市贸易价格比计划价格高出很多，不但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而且也不利于巩固农业集体经济。因为农业集体经济的产品，除了自给部分以外，大部分要按照国家的收购计划和计划价格卖给国家，而农民家庭副业经营的产品，除了自给部分以外，大部分可以按照集市贸易价格在集市上出售。如果后者收入过多，就有可能引起农民不重视集体生产，片面地发展家庭副业。所以，不论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或者是为了巩固农业集体经济，都有必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控制集市贸易价格。

我们控制集市贸易价格的主要办法：第一，是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保证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这是最根本的办法。第二，是合理控制货币流通量，特别是对农村的货币投放量，保持农民的购买力同国家对农村可能供应的商品量之间的平衡。如果农民手里有多余的货币不能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他们就会不愿意出售自己多余的农产品，从而影响农产品的收购和市场供应，引起集市贸易价格的上涨。第三，是国营商业



改进市場的供应办法。同时，供銷合作社除了按照国家計劃做好代购代銷业务以外，还要积极地正确地开展自营业务，有計劃地組織城乡之間、地区之間的物資交流，来逐步地代替私商的販运活动。并且通过这些办法来有計劃地調节集市貿易价格。第四，是国家对集市貿易的行政管理。集市貿易的价格，原则上应当由买卖双方自由議价，但是，如果发现投机商贩操纵物价，就应当通过經濟措施或者行政措施予以限制和打击。

集市貿易价格过高，和与此伴随的各地地区的集市貿易价格差距过大，还会助长私商的投机活动，甚至会引起一部分落后的农民棄农經商，因而导致資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我們除了加强市場管理，严格取締私商的长途販运以外，还必须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的购銷活动，来有計劃地平抑集市貿易价格，縮小地区之間的过大的差价，以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只要集市貿易价格接近于国家的計劃价格，只要城乡差价、地区差价縮小到使私商的长途販运无利可图，我們就能够有效地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商业不論在城市或者农村市場，都占有巩固的領導地位。

怎样保持市場和物价的稳定

在价格問題上，我們除了合理制訂各种商品的价格以外，还必须尽可能地保持物价的稳定。物价的稳定，不但有利于安定人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国家、企业和集体經濟单位的經濟核算，保证生产和交換能够正常地

进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核算，仍然是通过貨幣的形态来进行的。所以，为了保证正確地进行經濟核算，必須尽可能地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然，所謂稳定物价，主要是指保持一定的物价水平，而不是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冻结起来，即使发现不合理的現象也不进行調整。采取冻结物价的办法，不但不利于生产发展和商品交換，而且也不能使物价保持真正的稳定。在物价发生不合理現象的时候，进行合理的調整是完全必要的。調整物价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进行，不宜采取大量提价或者大量降价的办法，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升有降，逐步进行調整，避免物价的剧烈波动。物价問題并不是孤立的，它常常是整个国民經济問題的反映。因此，有許多物价問題，只能随着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

我們为了保证市場和物价的稳定，必須采取各种措施，来尽可能地保持各种商品、特别是主要生活資料的生产数量同需要数量之間的平衡，并且保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之間的平衡。在某些主要生活資料供不應求的时候，我們究竟是依靠价值規律，通过涨价的办法来恢复供求的平衡呢，还是依靠国家計劃，通过計劃供应的办法，来保持供求之間的暫时的平衡，然后通过增产計劃来达到更好的平衡呢？我們认为，应当采取后一种办法，而不能采取前一种办法。因为，前一种办法使收入多的人的需要能够得到充分滿足，而不能滿足收入少的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甚至有可能引起市場



投机活动；后一种办法则不但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够使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都得到必要的保证。当然，在任何场合都拒绝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对于某些非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如烟、酒和某些高档商品等，必要时也可以采取提价的办法来限制消费，增加财政收入和货币回笼。

对于稳定物价来说，保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之间的平衡，比保持个别商品或某些商品的供求平衡更加重要。如果某些商品的供求不平衡，至多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商品价格的稳定；如果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不平衡，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物价的稳定，特别有可能引起集市贸易价格的波动。因为，如果社会购买力过多地超过了商品供应量，就会使国家不得不减少商品库存，或者增加货币发行，这都将为下一年度的平衡带来更多的困难。城乡人民的购买力，总有一小部分在当年不能实现（这部分未实现的购买力表现为人民持有的货币和在银行的储蓄），这种现象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因为商品供应不足，当年不能实现的购买力过多，就要转移到下一年度去实现，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一年度的市场供求的平衡。

为了保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之间的平衡，首先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生产，特别是增加主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增加市场商品的供应，这是最根本的办法。只有市场商品不断增加，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目

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从而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同生产水平的提高相适应；而且，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应当比生产水平提高的幅度要小一点，这样，才有可能增加积累，以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因此，国家在努力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适当地控制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是用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社会购买力也可以用国家计划来控制，因此，即使出现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有可能使它恢复平衡，这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购买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职工的购买力，这决定于职工人数和工资水平，也就是决定于职工的工资总额。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地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但是，如果工资总额增加过多，超过了国家对职工可能供应的商品数量，就会引起许多商品的供不应求，甚至引起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对职工显然是不利的。第二，是农民的购买力，这主要决定于他们出售的农副产品的数量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收购的农副产品如果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固然增加了，国家可能供应的商品也同时增加，所以，这不会引起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如果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可能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而国家并不能因此就增加商品供应。国家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对农民增加财政信贷投放，也会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如果农民的购买力增加过多，超



过了国家对农民可能供应的商品数量，就会引起集市貿易价格的上漲，从而影响农副产品的收购，使国家、职工和农民受到損失。第三，是社会集团购买力，包括国家的基本建設投資、事业費、办公費、国防費、福利費，等等，以及集体經濟的某些开支。这些开支也必須加以控制，以免影响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間的平衡。

社会主义国家合理控制社会购买力的問題，实质上是人民生活同国家建設的統籌兼顧問題。在生产的不斷发展中，人民生活必須逐步有所改善，国家建設的規模也应当逐步扩大，以进一步加速生产的发展，使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到必要的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它經常关心改善人民生活，常常会出现許多商品一时滿足不了需要的現象。因此，如何合理控制社会购买力，适当安排消費和积累的比例，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訂国民經济計划时必须經常研究的問題。

* * *

为了制訂正确的价格政策，我們必須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价值規律，既充分利用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有利于我們的一面，又严格限制它的不利于我們的一面。我們調整价格，使它接近于商品的价值，大体上符合等价交換的原則，有时候甚至有意識地使某几种商品的价格稍稍高于或者低于它的价值，以影响这几种商品的供求关系，这就是利用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有利于我們的一面。我們在許多商品供求不平衡的时候，采取計划供应等办法来防止物价的波动，特别是保证主要生活資料价格的基本稳定，就是运用社

会主义經濟規律来限制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不利于我們的一面。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因此，价值規律还一定要起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占統治地位的是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在生产和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而不是价值規律。因此，就存在着限制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客观条件。不認識价值規律发挥作用的客观必然性，和不認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客观可能性，这两者都是不正确的。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在制訂和掌握价格政策的时候，必須反对两种錯誤傾向：一种傾向是，不研究价值規律，違反价值規律主观地規定商品的价格。在市場物价发生不正常現象的时候，不懂得运用价值規律来主动地、合理地調整物价，而采取簡單的行政措施来冻结物价，或者根据片面的認識对物价进行无原則的調整。这种办法，不但不能解决市場物价問題，相反地，有可能使市場物价更不正常。另一种傾向是，不坚持通过国家計划来調节物价和市場供求关系，盲目地順从价值規律。在市場供求不平衡的时候，不采取計划供应、計划收购等办法来尽可能地保持物价的稳定，而放松对物价的計划管理，听凭价值規律来影响物价，甚至企图通过物价的漲落来恢复供求的平衡。这两种傾向，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缺乏正确認識的結果。为了正确地制訂和掌握价格政策，我們必須在实际工作中很好地研究价值規律，自觉地运用价值規律，让价值規律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

· 陈 华 癸 ·

现代农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生产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①。无疑地，人们获得农业生产知识的最基本的活动是农业生产实践。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解决生产问题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

在原始的农业生产中，人们只会种植少数几种作物。这些作物都是些半野生的品种，用火耕杖种。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管理作物，保护土壤，而是边开垦、边丢荒，经营着生产水平很低的农业生产，过着不断迁移的半定居的农业社会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人们逐渐地积累了较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知识，也改进了一些生产工具。农作物的种类丰富了，半野生的植物品种逐渐地为人们自己在生产中培育出来的植物品种所代替。金属农具代替了木石器。无计划的丢荒农作变成为固定的、有计划的休闲轮作。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要求

保持地力长期不衰，也要求土地每年提供较多的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生产技术的要求提高了，人们逐渐地取得了精耕细作的知识和技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从原始农业发展到近代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全部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获得，都是人们依赖于生产活动，逐渐地认识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性的成果。

与此同时，人们从工、农业生产实践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逐渐地了解了自然界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从而产生了关于各种自然现象的统一的自然科学知识。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起，自然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为近代和现代的自然科学。近代和现代的自然科学，一方面同生产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相伴地发展着；一方面又走着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自然科学的各个分科遂逐渐形成。人们吸取和利用自然科学各个分科的成就，去研究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促使了现代农业科学的产生。因此，现代农业科学，是农业生产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现代农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1页。



高着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促进农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现代农业科学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大作用，可以用农业化学的发展及其对于农业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来说明。

在两千年以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肥料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重要意义。公元十四世纪我国王禎著的《农书》中，已经记述了多种多样的有机肥料和矿质肥料，包括粪肥、苗粪、草粪、火粪、石灰和泥粪等等。^①在这以后，西欧在十七世纪发现了硝土的肥田作用，十八世纪由于智利硝土的开发，而使硝土成为一种肥料。这个时期，也正是化学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科学而飞速发展的时期。到十九世纪，化学已经伸入生物学的领域，促使了植物生理学和农业化学的形成和发展。十九世纪农业化学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阐明了植物从土壤和肥料中吸取的营养料主要是一些简单的无机化合物，而在这些简单的无机化合物中，含有植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之中，有些是土壤中含量比较丰富的，植物用之不竭，有些是在土壤中比较贫乏的，不能满足农作物高额丰产的需要。在农业生产中施用肥料，主要就是补给植物所需要的在土壤中比较缺乏的营养元素。农业化学的这项重要发现，同当时正在兴起的化学工业相结合，产生了化学肥料工业。早期的化学肥料工业，除直接开发和利用富含硝酸钠的智利硝矿外，还从骨粉和海鸟粪中提制过磷酸钙。接着，开发了各种磷矿，用来制造更多的过磷酸钙，并且开发了钾矿，制造硫酸钾和氯化钾。在二十世纪初，化学合成氮肥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合成氮工业也就诞生了。化学肥料工业提

供了在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学肥料的物质条件，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这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在自然丰度相等的各种土地上，这相等的自然丰度能被利用到何种程度，部分地要看农业化学的发展如何，部分地要看农业力学的发展如何。”^②二十世纪以来，农业化学和为农业服务的化学工业继续发展，农业生产的化学化，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作用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样，现代农业科学的其他分科的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生物学是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它是研究生物的遗传变异、生长发育和物质代谢的科学。自从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的学说以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知识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遗传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一直到十九世纪，人们主要是依靠自然的恩赐和朴素的配种和培育知识得到一些较好的农、牧业品种。而随着遗传学和有关科学的发展，创造和选育新品种，才进入了实验科学的阶段。通过系统选种，杂交育种，以及化学引变和辐射引变等专门的选种育种的科学实践，不断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些优良的新品种。

关于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物质代谢的知识——植物形态学和生理学——是栽培农作物的科学基础。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一般

① 《农书》，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23—24 页。

②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51 页。



地可以分为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两个阶段，两阶段又各分为若干分段。农作物在每一阶段和分段各有特点，要求不同的环境条件。因此，在阐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阶段和各分段以及它们对于环境条件的特殊要求之后，人们就能够比较正确地总结先进的栽培技术经验，揭发其实质，同时还能够相应地提出新的栽培技术措施来。现代饲养家畜的先进技术，也是生产实践经验和动物生理学知识相结合的成就。

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和微生物学的研究，阐明了植物病虫害的本质，摸清了各种病虫害发生发展的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和有机化学在合成农药方面的成就相结合，创造了許多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技术，将农业生产从对病虫害无能为力状态中解放出来。在家畜、家禽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人们从研究陆地表层地质运动的规律和地面生物的生命运动的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揭发了土壤和土壤肥力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并且发现了成土母质、气候、植被、地形和水文等是影响土壤肥力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自然因素。合理的轮作换茬，可以创造优良的植被条件；平整土地，可以改善地形条件；深耕和施肥，可以改善成土母质条件；灌溉、排水和保墒耕作，可以改善水文条件。研究土壤肥力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有关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理论和应用，是土壤学和有关科学的任务。土壤学和有关科学的科学成就是用地和养地相结合，

合理利用土地的科学基础。

化学、物理学和数学是生物科学的基础知识，从而也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农业生产的化学化，除化学肥料的应用外，还包括杀虫剂、灭菌剂和除莠剂等等的应用。最新的物理学和数学的成就，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也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对于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农作物的抗逆防灾，均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建立在现代技术科学和工业技术力量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完成人们用双手和陈旧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所无法完成的生产技术活动，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

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是密切结合，互相推动的。农业科学来自农业生产实践，它反过来又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农业科学还从起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整个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吸取丰富的滋养。

二

现代农业科学所以能够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因为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各项成就，通过特定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更准确、更迅速地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研究特定的生产技术措施的增产效益，探讨同农业有关的客观世



界的各种规律。

农业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生产知识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速度很慢。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探讨特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效益，只能从观察这项技术措施对于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可见形态和最终产量来判断。但是，这样的判断是很难作为定论的。因为，同样的技术，应用在不同的土地上或者在不同的年景里，对于农作物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不一致的。只有经过人们大量的、多次的、甚至几代的生产实践，才能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比较准确地判断这个特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效益及其适用的条件。

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则不同。它除了从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中吸取丰富的滋养外，还从整个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吸取滋养。农业生产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它包含自然界的种种运动形态，而且这些运动形态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着。这些运动形态包含生物学的变化，也包含含蓄在生物学的变化之中的化学、物理的变化，以及造成生物生活环境的土壤、水和气候的变化。自然科学的每一种学科，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农业科学利用自然科学的各项专门成就，进行专门的农业科学研究，不仅能够观察农作物整体的变化，以及周围环境对农作物所起的综合影响，还能够更深入地分科研究包含在农作物整体变化和环境的综合影响之中的各个因素的变化，

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对于农业丰产所起的实际作用。

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可以通过特定的研究方法，把研究对象——特定的运动形态、特定的增产因素或环节——相对地孤立起来加以研究。我们也可能有效地控制环境条件，一方面使得研究对象在已知的环境条件中生活和运动，尽量减少未知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又可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制约关系。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本质联系，比较在复杂多变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更容易理解，从而能够较快地、较准确地作出科学的判断。

例如，种植豆科植物，一般需要肥料较少，而且能提高土壤肥力，对后茬作物有增产效益。早在公元六世纪，我国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中就写道，“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①。农民从生产经验中认识到，豆科植物只有在它的根上生长根瘤时才产生肥效。各种豆科植物种植在不同的土壤里，有的生根瘤，有的不生根瘤。在原本不生根瘤的土地上种植豆科植物，如果要它生长根瘤，可以采用土壤接种法，即将原本能生根瘤的土壤和种子拌在一起播种。这是长时期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而农业科学研究对于总结这一生产经验，并加以提高，起了显著的作用。科学研究发现，在上述生产实践中，最本质的因素是一种在土壤中生活的细菌（根瘤菌）侵入豆科植物，使后者形成根

① 《齐民要术》，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页。



瘤，根瘤菌在根瘤中生活，发生共生固氮作用。共生固氮作用将空气中的氮气（这是一般高等植物不能利用的氮素物质）变为植物的氮素营养料，直接地营养了豆科植物，还间接地改善了后茬植物的营养条件。对共生固氮作用的本质的阐明，导致根瘤菌肥料的制造和应用，这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科学研究专门地研究了包含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的微生物的运动规律。虽然通过科学研究探索这一微生物的运动规律也不简单，但比起通过种植豆科植物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来总结这一经验，是简单得多了。而且，由于根瘤菌是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培养根瘤菌需要农业生产环境所不能提供的工作条件。如果完全依靠农业生产实践的直接经验，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微生物学研究），是无法创造出制造和应用根瘤菌肥料的现代技术来的。

又例如研究合理施肥，为了判断特定的农作物在特定的条件下，究竟从土壤中取得多少磷素养料，从施用的肥料中取得多少磷素养料，从而判断特定的肥料或施肥方法的增产意义，研究工作者们就利用含有较高的磷的放射性同位素的肥料进行科学试验，从植物所吸收的放射性物质的比例来判断这种肥料或施肥方法的实际效果。经过研究，发现许多植物在幼嫩时期吸收土壤中的磷素养料的能力很弱，主要依靠吸收优质磷肥（如过磷酸钙）中的养料来满足它的生活需要，植物长大以后，吸收土壤中磷素养料的能力加强，可以完全或大部分靠土壤中的磷素

成分满足生活需要。这样，就阐明和发展了一项丰产技术措施，即在不少情况下，施少量过磷酸钙作为种肥，是十分有效的施肥方法。

这些都说明，利用农业科学去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探讨和掌握与农业有关的客观规律，可以大大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加强人们的洞察力，易于比较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判断，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

农业科学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要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使农业科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要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必须同时在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是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总结和提高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农业生产技术问题，充分发挥农业科学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是进行长远的、基础农学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揭示新的科学规律，掌握新的农业科学知识，从而使农业科学对原本不能够起指导作用的问题变为能够起指导作用。

充分发挥农业科学对当前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我国的农业生产，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现代的农业科学已经积累了许多确切的知識。这些知識的应用，是高产



量、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组成因素。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面对生产实际，运用这些知识研究和总结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解决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些知识的大部分还没有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例如，在种子方面，现代良种繁育科学已经掌握了利用杂种优势的科学技术。这项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能够提高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的产量，在有些国家已经被广泛应用。而在我国，目前还处于技术准备阶段。又例如，在植物保护方面，现代的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已经揭发了许多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并且创造了不少有效的防治方法。但是还需要经过大量的、针对各地不同情况的试验研究工作，才能使这些防治方法在广泛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充分地发挥作用。因此，在农业科学研究的这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科学技术力量。这样，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就能够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达到现代化的水平。

然而，这还不是农业科学研究的全部任务，还必需进行另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包含在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规律，有很多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掌握而又急待掌握的，这些也是我们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其对提高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作用来说，不一定能立竿见影。但是，就其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蕴含着农业科学研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巨大潜

力。这也可以用关于豆科植物和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的研究的历史经验来说明。当人们通过科学研究，发现了根瘤菌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人工培养根瘤菌的技术以后，接着也就创造了制造和利用根瘤菌肥料的生产技术，保证豆科植物结根瘤，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共生固氮作用的增产效果。然而，另外有一些非豆科的植物（如杨梅、木麻黄、橙木等等）也结根瘤，根瘤中也生活着特定的微生物（但不是根瘤菌），也发生共生固氮作用。对于这种特定的微生物，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人工培养的方法，因此也就不能够制出相应的微生物肥料应用于生产实践。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科学知识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除了动员足够的科学技术力量来充分研究、运用农业科学知识于当前农业生产实践外，还必需保证以一定比例的力量来进行许多新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农业科学研究要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保持实验科学的严谨精神。

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总结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再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这是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农业科学，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一项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活动。

先进的生产经验包括某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运用。总结和提炼先进生产经验的科学任务，就在于说明在这个或那个先进生产经验中究竟是如何地运用着自然规律的。进行



这项科学活动，当然首先要调查研究应用这些先进生产技术所引起的农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和有关的环境条件特点，用现有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说明这些现象，并且去粗取精，加以提炼，揭发出这些先进生产经验的科学实质。这样做是必需的。但从实验科学的要求来说，这样做，只达到了科学活动的假说阶段。进一步还需要通过一定的试验研究来考察假说的正确性，并作必要的修正。这样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才能够有力地指导生产实践，发挥先进生产经验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坚持田间试验的方法，是贯彻实验科学精神的中心环节。田间试验，是农业科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一切农业科学理论和技术措施都需要通过田间试验的考察。只有在农业科学理论或特定的技术措施为田间试验结果所证明时，才能认为它是反映了自然的和生产的客观规律。

进行田间试验，主要是用对比的方法。用田间试验的术语来说，采用某种特定技术措施的田块称为处理区，不采用这种特定技术措施的田块称为对照区。田间试验的目的，就是对比处理区和对照区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产量的差别，对这种特定技术措施的增产效果作出判断。

当然，在田间试验的实施中，也还需要排除一系列的实际困难，才能够从试验中得出清楚的结果，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因为两试验区的土地条件（土质、肥力、地形、水

文等等）和环境条件（如气候、光照、病虫害等等），总难免有些差别。即使在两区中所采用的农业技术措施完全相同，两区中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产量也不会完全一样。田间试验的经验指出，在一般的试验条件下，由于两区田地本身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产量差别，通常在百分之五至十之间，甚或更大些。如果特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效果达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或一倍以上，不论是通过一般的生产实践或田间试验，都不难作出肯定的判断。然而，更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效果并没有这样大的幅度，而是增产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十分宝贵的不可忽视的增产幅度。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逐步提高，主要是依靠这类幅度不很大的、这样和那样的增产技术措施的综增产效果的逐步积累。如何能够将增产幅度不很大的特定技术措施的效果，和由于两区田地本身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幅度差不多的产量差别区分开来，从而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就成为做好田间试验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田间试验的科学实践中，已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即田间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采用这些方法，就能够有效地解决这项困难的，但是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

田间试验不仅能够考察单一的增产因素的增产效益，还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考察多种增产因素的综增产效益。特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作用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要求一定的条件。在许多情况下，特定的技术措施要和另一些特定的技术措施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显



著的增产效果。如果我们在生产实践中或科学研究中，把这些增产技术措施一个一个孤立地加以比较，有时往往得不出什么有益的结果，甚至会作出不正确的判断。针对这种情况，在基本上阐明了有关技术措施的增产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多因素的田间试验，能够帮助我们以较小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比较正确的科学判断。例如，在很多种土壤上，单施氮肥能够增产，单施磷肥却不能增产，只有在施氮肥的基础上加施磷肥，才能获得施用磷肥的增产效果（亦即在氮肥增产的基础上施磷肥进一步提高产量）。这样，如果只进行单施氮肥和单施磷肥的田间试验，就只能得出施氮肥能增产、施磷肥不能增产的错误结论来。而只有正确地进行研究氮磷联合效用的多因素田间试验，才会得出符合上述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结论。

任何田间试验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所得的结果，严格而论，只是在这特定的试验条件下发生作用的规律。由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条件变化很大，如果把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得到的田间试验的成果，直接地在很大范围内推广应用，是有一定的盲目性的。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由于这种盲目性而造成损失，还必须进行区域试验（即区域性的田间试验）。根据土壤、地形和气候的区域性特点，在各个区域选择确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区域试验，是将研究成果多、快、好、省地推广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的重要环节。区域试验既是鉴定性的，也是试探性的。即

使是区域试验的成果，也还需要通过千百万人在生产实践中最后地加以考验和发展，才能够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因素。

还需要指出，在农业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同等地重视包含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物质运动的实质和这些物质运动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农业科学研究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一般而论，同样的规律决定着土壤中磷素的变化和植物的磷素营养。但是，在不同的土壤中种植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对于磷肥的需要量和施用方法却是有很大出入的。在长江流域的土壤上，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很显著；在它附近的冲积土上，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就比较小些。在同样的冲积土上，种稻、麦，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就比较小，或者不增产；种油菜、紫云英，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就比较大。显然，关于植物磷素营养的科学知识，只有这样具体化之后，才能起指导合理施肥的实际作用。研究农业生产过程中特定的物质运动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作用，也主要是采取田间试验和区域试验的方法进行的。

要做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使其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特定问题时，需要掌握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吸取和利用自然科学中一切有用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科学研究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紧密联系起来，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及各种



边缘学科的发展,对于农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并将产生更大的作用。如从植物营养的研究来看,在十九世纪中期,微生物学还处于大发展的初期,还没有伸入农业科学的领域。当时,在初步揭发植物的无机营养规律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土壤供给植物养料的能力(或称为土壤的化学肥力),理解为土壤中含有植物营养元素总量的多少,以及它们溶解性的大小问题,并且主要是以化学变化的规律性来解说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变化的规律性。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变化,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土壤中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因此,只有在十九世纪末叶,微生物学伸入农业科学领域以后,农业化学和土壤微生物学的知识相结合,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理解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显然,对当时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微生物学知识就成为研究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所必需具备的自然科学知识。

然而,这还不是解决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所必需的全部自然科学知识。到二十世纪初,生物化学又诞生了,而且很快地伸入到农业化学的领域中来。生物化学

有力地阐明了各种营养元素在植物体中的变化规律,和它们对构成植物体质和经济性状所起的实际作用。接着,生物物理学又诞生了。作为生物物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方法,是揭发植物、土壤和肥料三者之间的物质运动规律的有力手段。因此,要研究关于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现代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就必须同时具备现代化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不掌握这些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做好。

同时,也可以看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日趋专门化。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得到更好的保证,以便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就必需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地建立起农业科学研究的各种专门学科,并且要求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深透地掌握一门科学的理论和实际,以及相应的试验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实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分工与协作,在积年累月、锲而不舍的科学实践中,积累丰富的科研成果,解决我国农业技术改革中所提出的综合技术任务。

更正

本刊一九六三年第六期第十一页右栏倒数第十行“据统计”,应为“据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统计”;从倒数第三行“国家”起至倒数第一行“工业”止,改为“机械工业投资基金和科涅公司分别控制着部分机械制造和采矿工业。今年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电力生产”。



深入生活，提高音乐创作质量

馬 可

音乐创作像任何文艺创作一样，需要作家具备生活、思想、技巧三方面的修养。这三个方面是辩证地体现在创作过程中的。典范的作品，就是作家在这些方面成熟的表现。艺术家如果缺少任何一方面的起码修养，不论是怎样的天才也很难写出艺术作品来；任何一方面的严重缺陷，都会影响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因此，可以这样说：对于某一个作曲家说来，哪一方面的修养特别不足，与其他方面不相适应，那么，提高那一方面的修养就成为他提高创作质量的关键。但从我们今天音乐创作的实际情况来说，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生活修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音乐艺术是有特殊性的，音乐家并不需要像文学家那样深入生活，只要感染感染气氛和听听民歌就够了。这个论点关系到音乐美学上一些根本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音乐的特殊性是什么？由于这种特殊性，音乐家和生活的关系是否就应该疏远一些、间接一些才好呢？

一切艺术都是以形象思维反映生活现实的，音乐的特殊性在于它赖以进行形象思维的手段不同。音乐是以声音（或者确切地说，是用“乐音”）为材料来反映生活。音乐家必须，也只能在以声音为材料的范围内去

反映生活，创造形象。以声音为材料创造艺术形象，是有它自己的困难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可以直接在生活中找到模特儿，可是描绘音乐形象的模特儿就不能在生活中直接找到。音乐语言是一种感情的语言，这是客观现实在作曲家主观上的反映。如果作曲家对现实生活没有丰富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如果作曲家不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和战斗的姿态去对待生活，无法获得感情上的强烈共鸣，他就无法正确反映现实，也就无法创造出真实感人的音乐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见解：音乐既然是以声音反映现实，那么，音乐家只要从音响世界中感受生活就够了。这些同志未尝没有一片热忱和良好的愿望，他们以高度职业敏感的耳朵来谛听这个世界，两手不离开谱纸，随时记下一切自然界的音响，人们的语言音调、感情音调和各种民间音乐的旋律。这种热忱是可贵的，这种劳动也决不会白费；但是，忽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忽略了从音响世界以外去感受丰富的生活，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些同志可能以为：全面观察生活只是文学家的事，因为他们在作品中既要描写外形，又要揭示内心，既要绘声绘色，又要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其他方面的艺术家就可以不同，美术家的眼睛里只要有色和光，音乐家



的耳朵里只要有声波的振动就够了，或者说这样就至少在主要方面把握了生活真实。

诚然，客观世界是通过声、光、色……等物质运动现象被我们所感知的，但是，这些现象就是在自然界中也从来不是互无关联的孤立存在；至于在艺术反映的主要对象——人和各种社会现象——方面，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人的思想感情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也不是一些彼此孤立的存在。从感受者方面来说，任何人的感受器官都不是光电管、拾音器、寒暑表之类的机械的综合，而是更高级的认识手段。人的感官感受通过高级神经活动的联系，能够得出客观世界的完整映象，能够透过事物现象认识其本质；但如果离开了这种联系，疏远了这种联系，就很容易作出片面的或歪曲的认识。因此，全面地观察生活不仅是文学家的事，也是一切艺术家的事。各种不同的艺术家应该有各自高度专业敏感的器官，但不能只依靠它来感受生活，更不能只依靠它来概括生活、创造形象。贝多芬晚年失听，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但如果一个人生来仅有一副素质优异的听觉器官，决不可能成为音乐家。音乐表现生活的材料是声音，但音乐家去感受和认识生活却不能只依靠声音，或主要依靠声音。音乐家在生活中更多地注意音响世界是必要的，可是这只有作为全面认识生活的一个方面时才有积极意义。不适当地只从专业技术角度去感受生活，常常会成为进一步深刻认识生活的障碍。比如我们长期没下农村的同志到了农村中，可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这时候如果不去了解农村中所有制的变化，群众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道

德品质上的变化，而只沉溺于民歌音调和语言音调的揣摩中（人民生活形态的诸种变化，并不一定立竿见影式地反映在这些音调中），并指望从这里表现出新鲜的人民生活气息，能不能够成功呢？我是有些怀疑的。

认为音乐家体验生活只要感染一下气氛，浅尝辄止，这是片面强调音乐的特殊性的另一种表现。不错，音乐是一种以表达感情见长的艺术，要求它像造型艺术那样地描绘形象，或者像语言艺术那样具体而微地状写思想或实体的运动细节，都是不公平的。然而，能不能因此就把各种艺术排出一个它们与生活关系密切程度的程序表来，而将音乐排在末位呢？是的，有过一种这样的程序表：在这个表上，艺术按照它与物质世界联系的程度，分成七个等级，而音乐是因为它与物质世界联系最少，所以居于艺术中最高的等级。这个表是黑格尔排的。黑格尔在这里是把艺术作为他的“绝对精神”演化的一个过程（按照这个过程，艺术将演进到宗教），而给音乐以这样“高”的估价。唯心主义者由于音乐似乎是“与物质世界联系最少”因而对它青眼相看。我们是唯物论者，不会相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彻底澄清唯心主义艺术观的漫漫迷雾，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认为音乐家不需要深入生活，或者只要到有“气氛”的地方嗅一嗅就足够的观点，多少是受这种迷雾缭绕着的。

什么是“气氛”？它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根据我们的艺术家们的习惯，大概是指生活中富有抒情性或戏剧性的场合吧。当皓月东升，山林里响起恋歌；当雨后乍晴，田野间回荡着劳动号子；或者当红旗招展，锣鼓



喧天，人們正集会进行挑战比赛；……我們的作曲家感动了，行李卷儿还没有打开，就馬上进行一首交响乐的构思。并不是說这种感动不是真实的和可貴的，我們也不是一般反对作曲家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下匆匆进行創作构思。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作曲家沒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对这种生活沒有深刻的認識和感受，那么，就不会因为这种触发而激起創作灵感，写出深刻感人的乐章来。而且，这些場面固然是生活感情的某种高潮，但它不是唯一的高潮，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如果讲感情，那么，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紅旗飄揚，歌声嘹亮”，但当一个老农和你促膝談心終宵，摆出了他一生的经历，最后在晨曦中默默地久久地注視着一个人的挂像，你沒有为之深深激动么？当生产队已經收工，劳动号子已經停歇，暮色中还有人在田里拔除适才沒有鋤淨的杂草，这时候，你的心里不曾引起过波瀾么？（这些时候，在音响世界里有什么音乐的素材呢？）……生活是斑斓多采的，但就每一个細部来看，它并不总是唱着那么高昂的調子。它往往是无声无息的，一歛歛、一鋤鋤极平凡的劳动。正是这些平凡的劳动，才构成了我們偉大的、多采的生活。如果沒有这些日常平凡的生活基石，单纯依靠在有“气氛”的場合嗅一嗅它的气息，往往是肤淺的，甚至是靠不住的。当然，不能要求一支曲子概括全部生活，但是，却只有在全面地深刻地認識生活的基础上，才能把某一生活侧面反映得更深厚，更有力。

至于說到感情，我們是承认感情的，也承认音乐是以表达感情見长的艺术。但无论

怎样也不能用这一点来证明音乐是与生活现实联系最少的一种艺术。

什么是感情呢？感情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个人的感情总是和他的生活经历、立場观点紧密联系的。过去有些音乐美学家善于在这个問題上作出玄虛的文章。他們把感情抽象化，似乎有一种一般的爱，一般的恨，而音乐家就是这种感情特别发达的人。他們讲过許多故事，证明越是偉大的音乐家，越是具有这种非凡的天賦，以至早在他們的青少年时期，就显露出奇妙的才华，写出了不朽的作品；生活么，不过是对天才的世俗折磨罢了。对于这些人所讲的綺麗而又哀惋的故事，我們除了要糾正那些被故意夸大和歪曲的部分以外，必須指出这样一点：历史上任何偉大作曲家任何时期的作品，其所表现的感情内容，从来沒有超出他在写作时的生活修养和世界观所及的范围，往往沒有超出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限度，而毋宁說是与这些恰相适应的。莫扎特六岁时写的小步舞曲，沒有超出童稚的单纯和他当时所受的音乐風格的教养。貝多芬的九个交响乐，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遭遇史，但更应该看作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十九世紀初叶德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要求自由解放的精神的反映。法国革命歌曲在他的音乐中迴响着，德国民間音調在他的音乐中閃爍着，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呼声在他浩瀚綺麗的乐章中高唱着，岂不正因为他所抒发的感情是这样“世俗的”，所以才获得了他的历史地位么？

“可是貝多芬并没有去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呀！”有些青年同志曾經这样議論。那意思



是說，可見音樂創作的根本問題不在於什麼生活啦、思想改造啦那一套，而是一種別的什麼東西，而是一種……技術加感情的升華。是啊，貝多芬沒有背起行李卷兒去“體驗生活”，可是，這個窮樂工的儿子，在潦倒的一生中，受盡了歧視、凌辱和剝削，他的坎坷遭遇，幾曾是我在解放後長大起來的年輕同志所能想像的！一方面，今天我們革命的音樂家不能只以貝多芬為榜樣，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現實生活的教育下，貝多芬的思想也在不斷發展，以至對反动統治者說出“如果我能够像一個將軍那樣懂得戰術，如同我是一個作曲家懂得對位法一樣，那我就要給你們點顏色看看”那樣的豪語，而對人民的態度則是“我的藝術就應當只為窮苦的人們服務”。他是站在那個時代民主革命的先進人物行列中的。

如果說外國古典作曲家的事談來終究有些隔閡，那麼我們中國現代作曲家的經驗總是比較親切和易于理解的了。冼星海在回憶他青年時期在巴黎苦學的一段經歷時寫道：

“我寫自以為比較成功的作品《風》的時候，正是生活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我住在一間七層樓上的破小房子里，這間房子的門窗都破了，巴黎的天氣本來比中國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風，我沒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點燈寫作，那知風猛烈吹進，煤油燈（我安不起電燈）吹滅了又吹滅。我傷心極了，我打着戰聽寒風打着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湧現起來。我不能自己，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青年時代的冼星海，就是這樣在生活的

磨煉中懷着愛國主義的激情，寫出他早期的優秀作品《風》。當他回國以後，馬上投身於火熱的民族解放鬥爭，不斷地追求革命，追求進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發見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他繼續寫出了《黃河大合唱》等思想上和藝術上更趨成熟的作品。

並不是說我們今天的作曲家必須再跑到巴黎的小房子里去讓風吹一吹，也不是說如果不挨凍受餓，就成不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裡只是證明，一個革命的音樂家，必須具有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任何感人的音樂作品，都不是作曲家心靈的遊戲，都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感情的升華，而是有血有肉的生活的結晶和先進的世界觀作用的結果。一個藝術家當然不可能將世界上所有的生活都去嘗遍，但他對於所要表現的題材，總要有直接的感受和相應的知識修養，而且這些感受和修養越是豐富，理解越是深刻，作品才越有可能得到成功。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感受和修養，而且也無心去追求，只靠“氣氛”來熏，恐怕是熏不出什麼能够耐人尋味的東西來的。

* * *

有的同志認為音樂創作可以利用民間音樂素材作為原料，而民間音樂是飽含生活氣息的，音樂家只要予以藝術上的加工，不一定要再到生活中去體驗。其實，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早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給我們作了解答。他告訴我們說：“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 and 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



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①到生活这一唯一的源泉中去学习、体验、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没有根基于生活的创造就没有艺术，模仿和硬搬只会使艺术停滞、灭亡。音乐工作中对遗产的继承、发扬和利用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說在每项工作中都需要对生活有正确的理解，都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作曲家采用民间曲调进行创作，不过是以之作为素材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民间曲调本身而是作曲家对生活的理解。甚至于在那种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民歌改编工作中，也不能不体现着改编者对生活的理解，而这可以說是改编后的作品的灵魂。我们有些作曲家，研究了一些以民间音乐为素材的典范作品，但只是从艺术手法上，而没有更进一步地理解这些手法怎样体现了作曲家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于是也按照某种范本从印出的乐谱中搜选一点民歌素材，进行各种高度专业化的加工，加一个动人的标题，认为这就是精致的艺术作品。我一点没有轻视这种劳动的意思，只是觉得这未必符合真正艺术创造的规律。因为这种做法不是走的从源（生活）到流（艺术成品）的路子，而是从流到流的路子。艺术家不能指望仅仅从已有的艺术作品（哪怕是最优秀的作品）中解决自己艺术创作的全部问题，不能指望仅仅从艺术中观察生活。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从生活中观察艺术，再从艺术中观察生活。不经过从生活

到艺术又从艺术到生活的反复的验证，也就不算真正理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我们有许多优秀作品，其创作过程和经验值得我们深思。例如歌剧《洪湖赤卫队》，大家无不为之富有表现力和地方色彩的曲调所感动。自然，你可以作这样的技术分析，指出剧中某些曲调与洪湖地区流行的民歌、戏曲音乐有怎样密切的关系。但如果只是这样，那就非常不够，那就仿佛是說它的作者们不过是在搜寻民间曲调方面有耐心的幸运儿。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据作者们的自述，他们全团先后曾三次深入洪湖地区，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斗争和劳动，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经历过这样一段生活以后，当地民间音乐的所谓“色彩”、所谓“风格”在作者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与群众生活情感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技术风格。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作者们不去考虑什么风格的追求，风格却在笔下涌现了；不去考虑民间素材的运用，素材却源源而来。民间曲调在这里已经成为作品有血有肉的一个部分，不是装饰，不是作者猎奇或者侥幸的产物。

这样岂不是提倡写任何东西必须要到现场去体验？是的，从总的精神来说，是提倡这个。然而一个人怎能为了改编几首民歌而去旅行全国，或者为了处理历史题材而回到古代？问题不在于要作曲家去做这些不可能的事，而在于从认识上明确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正确认识了这个关系，就会下决心去深入生活，就会争取一切机会去作现场的体验（如果没有可能，也会积极地从间接方面进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82页。



了解)，而不是指望从艺术中解决生活问题。许多民间曲调，如果只从技术上来看，它是何等“简单”“贫乏”，而当你到现场中去观察时，它却又有怎样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表现力！这种生活现场观察体验，对于一个音乐家的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的启发，看来是无形的，又没有什么足以令人倾心的技术性；可是，决不能低估它的意义，决不要轻视这种启发。我们有些音乐家就是因为忽视了在生活现场中观察体验艺术，而去追求别的什么东西以图“提高”，结果是高则高矣，但大大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风格，脱离了群众。

总而言之，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生活修养是一个艺术家最根本的修养；对于我们今天大多数音乐家来说，深入生活是提高创作质量的关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生活正在大步跃进，日新月异，人们只要思想一停滞，就会被生活甩在后边。在音乐家中，虽然有不少人过去曾参加过群众斗争，但要表现今天的新鲜气象，要创造新的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就必须再到生活中去，依靠过去的“资本”是远不够用了。我们一些更年轻的同志，有些从红领巾时起就在新社会里长大，除了学校和家庭外不大熟悉社会，更不熟悉旧社会，因而也不能深切体会到群众要求摆脱一穷二白的决心和气薄云天的革命精神，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到生活中锻炼和学习了。更重要的是，不仅为了学习生活知识和生产知识，而是为了在群众斗争中进行思想改造。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长大的人，脑子里也会自然而然地长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论年轻的或年

长的，都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

在明确了生活对于艺术创造的关系，在明确了音乐家也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原则以后，考虑音乐的特殊性和音乐家体验生活的诸种方式就是妥当的和必要的了。没有必要让所有的艺术家都采取同一方式去体验生活，没有必要让艺术家在生活中忘掉自己的业务。归根到底，作为一个艺术家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还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艺术创造，为人民服务。如果完全脱离了业务，又怎样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作曲家为了广泛吸收这方面的营养，常需要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多处跑跑，扩大眼界，增加见闻，但这不应该与有重点地深入生活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到处浏览才是作曲家体验生活的最好方式，而在一个地方多呆几天，就会失掉新鲜感觉，这对于音乐创作是没有好处的。

深入生活的方式、方法要以多样化的形式来解决。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条件，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方式。音乐家在深入生活中如何根据音乐的特点进行形象思维，如何把生活形象变成音乐形象，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总的说来，在思想上更加明确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丰富创作的源泉，进行思想改造，是创作出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优秀音乐作品的关键。我们今天比过去的艺术家有着更好的客观条件，因此更应该下决心作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



談

落

實

· 唐平鐸 ·

落实，是做好任何事情，完成任何任务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尤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各个革命时期，都要制定一些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所必需的具体政策，特别是近几年来，党中央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在许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是我们进行各种具体工作的准则，是我们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使这种从群众中来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正是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一项根本任务。我们说的落实，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一切工作都不能离开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就不可能达到做好工作、改造现实的目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切正确的方针政

策，只有当它变成千百万群众的实际行动的时候，当它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显示威力，成为改变现实、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可见，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是一个落实的问题。

怎样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得到落实呢？首先是要很好地研究和深刻地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曾经说过：“在为着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集的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①这是就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而说的，其实一切工作也无不是这样。我们对待党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一定要在干部中，首先是要在党委内部认真地讨论研究。弄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而不那样规定；为什么要这样要求，而不那样要求；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那样做的坏处又在哪里。特别是对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党委更应当反复地深入地进行研究，把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都摆出来，进行讨论争辩，最后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思想认识上一致了，才可能有行动上的一致。只有思想上和行动上一致了，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有切实的保证。

有一种作法是不好的，党的方针政策提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1页。



出来了，下达了，党委本身不去很好地讨论研究，对这些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就去讨论具体措施和解决实际问题。当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讨论或者不应当讨论，而是说，应当首先弄清楚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讨论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如果不先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无法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左右摇摆，犯错误。有的同志有一种不正确的想法，似乎党的任何方针政策，他们不经过认真研究就会了解，因此，他们的任务只是布置下面如何执行。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都是集中了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来的，一个领导同志，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经验 and 思想政治水平，可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但是，个人的经验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不去认真地进行研究，就难以全面地、深刻地领会；如果再凭着自己对方针政策的一知半解或者片面理解去办事情，那末，他就免不了要使党的方针政策走样，使工作受到损失。

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有群众的自觉行动。所以，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仅领导干部要理解，而且要使广大群众也理解。毛泽东同志说过：“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又说：“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

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②党的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它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而是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集中、提高制定的，它已经不再是群众意见的原始形态了。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所理解，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就必须一字一句、不折不扣、原原本本地向群众进行透彻的说明。不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把党的方针政策切切实实地交给群众，要想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地彻底地贯彻执行，那是不可能的。

要使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既不能不问情况，照抄照转；又不能标新立异，自搞一套。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③在贯彻执行党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时候，不分析研究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和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只是机械地照抄照转，生搬硬套，即使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那也是一定落实不了的。但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其目的只是、也只能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成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它在实际工作中真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②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4页。

③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正开花結果，落到实处。因此，决不能片面地理解“从实际出发”，而离开、甚至違反党的方針政策。我們这里說的从实际出发，是指按照具体情况来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以党的方針政策为准繩来处理实际中存在的各种具体問題，决不是那种強調“情况特殊”，借口“結合实际”，不执行或者擅自修改党的方針政策；更不是那种从狹小的局部利益出发，标新立異，另搞一套来代替党的方針政策。如果那样，就是一种无組織无紀律的錯誤行为。党的方針政策是党的生命，是我們进行任何一項工作必須遵循的指針。我們必須坚决根据党的方針政策办事。

在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的时候，下級党組織根据本部門、本单位、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将党的方針政策加以具体化，按照正常手續，作些必要的补充規定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这种补充規定决不能違背党的方針政策的基本精神，更不能使自己的規定和党的方針政策对立起来。

落实的再一个重要問題，就是要加強具体指导，防止和克服指导工作的一般化的毛病。党的方針政策和工作任务下达了，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号召和一般的布置上，缺乏具体安排、具体措施、具体指导，缺乏經常的、反复的檢查、督促，那仍然是落实不了的。

我們在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的时候，必須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切切实实的安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時間做，什么人做，用什么方法做，采取些什么措施，一些可以預見的实际問題如何解决等等，都要有明确的規定，做到事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为

了加強具体指导，保证工作落实，最重要的一点是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切实地督促檢查。领导干部深入下去，由于他們的水平比较高，經驗比較丰富，观察問題比較全面，因而便于发现問題，及时解决；便于抓住先进經驗，及时总结推广，指导全面；便于培养提高干部。而对领导干部本身來說，也只有亲自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正确指导，避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要使党的方針政策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在实际工作中深入地貫徹执行，是不容易的，这需要經過不断的十分艰苦的努力，做許多深入細致的工作；需要反复地讲，反复地做，有时甚至讲几十遍、几百遍，做几十次，几百次，才能够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戶曉，真正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里重要的一条就是抓住不放，坚持到底。一个方針，一項政策，一件工作，一个任务，抓住了就不能輕易放掉，要长期坚持下去，随着情况的变化发展，使工作一步一步地更深入、更仔細，成績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扩大。养成抓住不放，坚持到底的精神，这是我們各项工作落实的一个重要前提。

落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它是对我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一个全面的檢驗。我們一定要遵照毛澤东同志的意見，发揚我們党的优良傳統，面向实际，反对空談，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把党的各項方針政策貫徹到实际工作中去，貫徹到群众中去。



平凡工作与远大抱负

苗作斌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在平凡的劳动岗位上，怎样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实现自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抱负，创造出不寻常的成绩，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这是许多青年人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早就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的许多英雄人物，也给我们做出了具体榜样；雷锋同志以他战斗的一生，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正是要我们学习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沿着雷锋同志所走的道路前进。

雷锋同志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出现的英雄人物。他在党的细心培育下，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亲切启示下，真正做到了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四句话：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的立场、思想、品德和风格，充分反映了我们新时代的精神面貌。雷锋同志的这种高尚品质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基本最突出的，是他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安于平凡工作，甘心做革命的螺丝钉的伟大忘我精神。

雷锋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懂得“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根本道理，树立了终身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壮志雄心。同时，他又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他从不拒绝任何细小的事情，从不挑挑拣拣，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总是无条件地根据工作的需要，从自己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着手，脚踏实地地为人民服务。凡是有益于人民的事，不管它多么平淡无奇，多么为人所司空见惯，他都认为是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积极去做。正因为这样，他在极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闪烁着共产主义光彩、感人至深的事迹。雷锋同志这种模范行为，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要想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卓越的成绩，要想对祖国、对人民有较大的贡献，就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热爱平凡工作，安于平凡工作。

列宁说过：“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①这一句为大家所熟知的話，告

^①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5页。



訴我們一个真理：任何偉大的事业，都是从細小的平凡的工作开始的，都是由无数細小的工作积累而成的。我們国家的偉大建設是这样，每个人的一个創造、一个成就也是这样。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无比壮丽、无比輝煌的，但是这壮丽、輝煌的图景，正是与种种平凡、細小、簡單、具体的工作分不开的，正是由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創造出来的。一个人在工作中的重大成績，杰出創造，那也是他在集体的帮助下，平日辛勤劳动的集中表現，是他在党的教育下，长期修養鍛炼的自然結果。我国古語中有这样一类的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这些话很生动地說明了这个道理。因此，要想創造不平凡的業績，首先就要安于平凡工作，从日常工作一点一滴做起。心安而后才能专注；专心致志，刻苦钻研，埋头苦干，而后才能有所創造，才能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給的任务。一心只追求惊天动地的業績，而不安于或不願意做日常的細小工作，认为做这些工作，就是浪費青春，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違反事物正常发展規律的想法，因而就不能把事情办好，当然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負。

在我們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目的而有組織、有計劃地进行的。我們每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偉大革命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就好像人們通常所說的一架机器上的一个螺絲釘一样，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一个人对于革命事业是不是有貢獻，

首先就是看他能不能發揮螺絲釘的作用和怎样發揮螺絲釘的作用。如果是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处处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决心做个“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那末，尽管他所做的工作可能是平凡的，細小的，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偉大的，高尚的，值得学习的。雷鋒同志从沒有想过哪个工作不重要、不光荣。他不論做什么工作，不論在哪个崗位，都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严格地按照党的要求、人民的需要去做。我們正是从他这种对待党交給的各项工作的态度上，从他完成任务的行动中，看到了他那对人民事业的无比热忱，他那爱憎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風格和奋不顾身的无产階級斗志。

安于平凡工作，甘心做革命事业的螺絲釘，决不是說可以胸无大志、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滿足現狀。充沛的精力是由偉大的目的而产生。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負，那末，他的工作就必然会因为缺乏明确的远大的奋斗目标而变得毫无生气，只要工作任务一般地完成了，也就心滿意足了，不再有什么更高的进步要求和力爭先进的积极性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甘居中游、意志衰退的表現，为每一个革命者所不取。雷鋒同志，既安于平凡工作，又有远大理想，所以，他才具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力爭上游的革命精神；他才坚持不懈地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識，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他才永远不滿意自己“在生产上只能作到完成自己的任务和达到每天的定額”，总是以最高标



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他才不仅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一切任务，而且还积极主动地寻找各种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去做。也正是在这种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指导下，他的生活才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丰富多采，天天向上；他的工作才热气腾腾，总是充满一派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

由此可见，安于平凡工作和树立远大理想，两者是统一的，互相结合的。安于平凡工作，才能切实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把理想变为现实；有远大理想，才能高瞻远瞩，充分认识自己眼前工作和伟大事业的关系，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在任何情况下，做任何工作，都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我们党从来就反对那种没有理想、庸庸碌碌、唯唯诺诺、随波逐流、不动脑筋的庸人和懒汉，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远大抱负和壮志雄心；同时又指出，远大抱负、壮志雄心只有通过每个人艰苦的、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劳动这条路，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人走上错误的道路，不是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空谈家，便是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者。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广阔的天地，供人施展才能，实现远大抱负，创造不平凡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不能为人民做出重大的贡献，能不

能获得人民的尊敬和器重，主要不在于他做什么工作，而在于他以什么思想和态度对待工作。雷锋同志的工作地区、工作岗位、工作部门，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变化，但是，不论在哪里，他把什么工作都做得很出色，成为先进的、模范的人物。他所以能够这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诚的心。用雷锋同志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只长着一个心眼，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正因为有了这颗赤诚的心，他就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顽强的革命战斗精神，战胜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人民创造出优异的工作成绩。向雷锋同志学习，正是要学习他的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一丝不苟地、创造性地做好党和人民指派给的任何工作。

真理向来都是老老实实、平凡朴素的。有许多道理，我们早就知道，早就懂得。但是把这些平常的、熟知的真理，贯彻到日常行动当中去，使之化为活生生的实际，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严格的刻苦的精神，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雷锋同志做的各种事情，并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惊险稀奇，而是很普通、很平常的，每一个人只要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到。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像雷锋同志那样，“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处处听毛主席的话，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如果是这样，在任何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可以成为出色的人民勤务员。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前言

一 批判经济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任务

崇拜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的经济主义

各国机会主义者称兄道弟，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

二 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的革命政党而斗争

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党路线

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保持布尔什维克的独立和纯洁

三 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反对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

革命的爆发和策略路线的分歧

无产阶级应不应当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怎样对待群众的暴力革命行动？

半途而废，还是不断革命？

对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两重估计

四 在斯图加特大会上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自己的威信操纵会议，散布错误影响

经过斗争，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决议

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变”和工会中立论

不应当把德国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

五 在革命低潮时期同修正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

“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哲学

从康德出发，回到休谟和贝克莱

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能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判断一个人、一个哲学派别，不能根据他们自己挂的招牌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斗争的序幕

六 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取消派崇拜资产阶级的合法性



“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和随风转舵的托洛茨基
同取消派是不能统一的

七 哥本哈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

反对合作社问题上的改良主义
在战争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暴露了叛徒面目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文献——巴塞尔宣言

八 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反动派驱使各国工人互相厮杀
维护巴塞尔宣言，揭穿“保卫祖国”口号的反动实质
社会沙文主义是社会党内熟透了的资产阶级脓疮

九 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

庸夫俗子不懂得“战争是政策的继续”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超帝国主义论”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机会主义“理论”

十 反对社会和平主义

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宣传革命，就是愚弄群众
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
阶级压迫还存在的时候，要求“废除武装”，就等于放弃一切革命

十一 反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民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
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
批判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谬论

十二 团结左派，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国际妇女会议和青年会议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团结革命派的重大成就
同考茨基派可以实行某种妥协，但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决不停止斗争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

十三 为实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必须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可是资产阶级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



誰在决战时刻拒絕武装起义，誰就是可耻的叛徒

十四 经过斗争，争取实现和平与和平共处

取得暂息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
实现和平共处，我們这方面沒有障碍
赢得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

十五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划分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首要标志
考茨基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革命暴力化为烏有
不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就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

十六 在革命浪潮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第三国际

无产阶级英勇坚决的革命斗争和机会主义者卑鄙无耻的叛卖活动
新型的、革命的国际和腐朽的、黄色的国际
只有同机会主义派别决裂，才能加入第三国际

十七 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工人运动内部的两种錯誤思潮
普遍规律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和党的纪律
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
革命者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
既要具有革命热情，又要保持冷静头脑

十八 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 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形势和任务
关于职工会問題的爭論
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傾向的批判
合作化——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九 坚决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支援世界革命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无产阶级要领导民族民主革命
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人口的大多数

結束語



前 言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时候写道：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

事情正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反对了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之流，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这个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马克思逝世之后，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领导下建立了第二国际，工人运动得到了广阔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和它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从工人运动内部来腐蚀工人阶级。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表现。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修正主义者公然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从一八九六年开始，伯恩施坦发表了許多文章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各国机会主义者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附和伯恩施坦主义。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主义采取了调和态度，后来也堕落为可耻的叛徒。这些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头面人物，把持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使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恩格斯逝世后，列宁担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修正主义者既然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列宁就不能不给予坚决的回击，同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论著中，揭示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后的几十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养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是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社会根源。列宁说：“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①同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把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使无产阶级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资产阶级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一样，总是相互结合、相互交替地用刽子手的镇压方法和“神甫”的欺骗方法来对付被压迫阶级，维持它们自己的统治。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中，资产阶级侧重于用一些微小的改良和虚假的让步，来麻痹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这种形势下，工人运动的许多领袖产生了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合法性”的盲目崇拜，同时，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路人也混入了工人运动的队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时的工人运动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②。

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阉割了马克思学说的全部革命内容。他们用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鄙陋的唯心主义来代替战斗的唯物主义；他们宣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减弱并可以消除，否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他们鼓吹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主要是在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引诱群众离开革命道路，阻止群众准备进行革命决战。在大战期间，他们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掠夺战争。十月革命后，他们恶毒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破坏苏维埃政权，贩卖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开同盟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开的敌人。

显然，由于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背叛所引起的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决不是什么枝节问题，而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这篇论文中，列宁写道：“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各种相反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刻性并了解到必须克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③

列宁批判了那种同机会主义调和的企图，认为“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走狗去奴役工人。”^④他说：“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9页。

②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页。

④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9页。



及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①

经过长期的、艰巨的、尖锐的斗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切根本问题上，彻底粉碎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潮；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摧毁的真理。他指出：帝国主义是壟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社会主义将冲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粉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同伟大的同盟军农民群众在不同时期建立不同内容的工农联盟，同时还必须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资本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影响进行不断的、长期的斗争，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创建了完全新型的、同机会主义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反对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终于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还创建了第三国际，团结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

下面是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历史情况。

一 批判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任务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年轻的列宁就踏上了革命征途。当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暴戾恣肆、穷凶极恶的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劳动群众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没有丝毫政治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①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3—244页。



下，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傳播起来，出現了第一批馬克思主义小組。但是，当时馬克思主义小組和工人运动很少联系，它們还没有了解到必須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傳鼓动工作。摆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基本任务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結合起来，把各个零散的馬克思主义小組統一成为一个工人政党，以便領導无产階級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在俄国当时的馬克思主义者中間，只有偉大的列宁才最深刻、最透彻地理解到了这个历史任务。一八九四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本书中，列宁这样說道：“当工人階級的先进代表領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領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們現時分散的經濟战变为自觉的階級斗争的堅固組織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階級（和世界各国无产階級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①

列宁如此明确地向俄国无产階級和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革命的战略任务，并且为实现这个战略任务同各种反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銳的斗争。

当时，民粹派是妨碍馬克思主义傳播、妨碍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建立的主要障碍。民粹派否认資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階級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階級；蔑視人民群众的偉大力量，主張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普列汉諾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給了民粹派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远沒有完成从思想上粉碎民粹派的事业。这一事业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彻底批駁了民粹派的理論观点和政治綱領，闡明了工人階級是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階級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俄国工人同农民的联盟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推翻地主資产階級的主要手段的思想。列宁指出，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已經放棄了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轉而主張同沙皇政府妥協，他們根本不是什么“人民之友”，而是富农階級的代言人。

列宁粉碎了民粹主义思想，也彻底地批判了“合法馬克思主义”。“合法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資产階級的利益。“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司徒卢威，辯护并贊美資本主义，号召大家“承认我們不文明，去向資本主义領教”。列宁指出，这些人是資产階級的自由派，他們把馬克思主义变成資产階級的改良主义，抹杀階級矛盾，拋棄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

崇拜自发性，醉心于經濟斗争的經濟主义

继“合法馬克思主义”之后，經濟主义流行起来，它是“合法馬克思主义”的后裔。一八九七年，列宁被沙皇政府流放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他密切注視着經濟派的活动。一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278頁。



八九九年，一部分經濟派分子发表了宣言，他們主張工人进行經濟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列宁看到了这个宣言，就把流放在附近各地的馬克思主义者召集起来开会，會議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书》。接着，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我們的綱領》、《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傾向》等。流放期滿后，列宁侨居国外，一九〇二年写成了有名的著作《怎么办？》。在这些論著中，列宁痛斥了經濟主义者背棄馬克思主义的行为，号召馬克思主义者同經濟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开展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

經濟派的基本錯誤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他們认为，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产生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們責难馬克思主义者“輕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列宁批判說，工人群众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会、必須同厂主作斗争、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不可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輸到工人中間去的。工人的社会地位使他們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是，資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淵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多。因此，經濟派反对把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識灌輸給工人，实际上就是在帮助資产阶级傳播他們的思想影响。列宁写道：“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們运动进程中創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問題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資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沒有中間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資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輕視，都是——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与否——加强資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②列宁指出，輕視革命理論的作用，輕視党的作用，其結果就是埋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沒有革命理論，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③，“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④

經濟派說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銘是“为改善經濟状况而斗争”，說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資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貴”，說什么工人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們現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⑤。他們还为自己辯护說：“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各个阶级的經濟利益在历史上有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⑥。列宁反駁道：“从經濟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經濟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結論，因为一般說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

①②④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352、350、336頁。

③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頁。

⑤⑥ 轉引自《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48—349、358—359頁。



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①把无产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斗争，就是使工人永远限于奴隶的地位，永远不能扫除沙皇专制制度，永远不能埋葬资本主义。当然，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重视经济斗争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②社会民主党如果局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就等于政治上自杀。“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政治斗争，那就等于河没有水”^③。

当然，经济派也不是绝对否认政治，他们还说什么应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列宁指出：经济派的“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则只是包含着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那种传统的倾向！”^④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就是力争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来改善劳动条件，而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指出，工联主义的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它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工人阶级绝不是“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必须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觉悟，把工人提高到社会主义政治觉悟的高度，把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

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的表现是，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经济派既然鼓吹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是“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因此，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革命组织。列宁深刻地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⑤。“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⑥。

列宁在反对经济派的斗争中，系统地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指出了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决定性作用，把理论的作用和党的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论证了党是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根本原理。

各国机会主义者称兄道弟，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

经济主义是伯恩斯坦主义的俄国变种，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第一个以最完整的形式，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①④⑤⑥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9、373、445、457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8页。

③ 《论〈PROFESSION DE FOI〉》。《列宁全集》第4卷，第252页。



从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一八九九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法国社会党领袖米勒兰，作出了实践伯恩斯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福将军一起担任部长的职务。国际工人运动中到处都出现了同革命派相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可以比做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中的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②

伯恩斯坦派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怎样“革新”的呢？伯恩斯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一、“我不仅不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依存于社会主义里‘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而且反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给与社会主义以纯唯物的基础”。

二、“随着资本家人数不断相对地减少，无产阶级幸福的不断增长或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就成为不断发展生产的唯一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由于欧洲各工业国财富的惊人增加，随着近代信用制度的伸缩性和工业上卡特尔的兴盛，地方或特殊部门的混乱影响一般产业界的力量大大减弱，至少在今后较长期限内，不是可以认为像过去产业上一般性的经济危机大概不会到来了吗？”“不再有从纯经济的理由来推断这种危机的发生的确实根据了。”

四、“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社会民主党，与其用不合法的手段和革命，还不如用合法手段，会使它的发展更顺利得多。”

五、“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③。

列宁读了伯恩斯坦的书以后，立即怒不可遏地写道：“书的内容越来越使我们吃惊。理论上太差了；而且是重复别人的话。光说批评，实际上连认真地进行独立的批评的尝试都没有。实践上是机会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④。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6页。

③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7、51、59、72、3、5页。

④ 《给玛·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2页。



列宁指出，伯恩斯坦“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① 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质，就是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之庸俗化，就是企图用争取改良来代替革命斗争，就是企图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

列宁透彻地说明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他说：“革命者从不放弃为争取各项改革而斗争，从不放弃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和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忘记，有时敌人主动退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分割和更容易地击溃进攻者。他们从来也没有忘记，只有永远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采取不正确的步骤和不犯可耻的错误。”^②

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阴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③

列宁揭穿了伯恩斯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革新”和“批评自由”之类的调调。伯恩斯坦派所谓“革新”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来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④。伯恩斯坦派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抛弃完整周密的理论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给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由。伯恩斯坦派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无能，只不过是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法。列宁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⑤“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主义政党变成一个‘正教’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教徒’。我们明白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而且毫无意义。”^⑥

列宁无情地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列宁认为必须用创造精神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9页。

②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列宁全集》第5卷，第57页。

③④⑥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6、187、187页。

⑤ 《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72页。



来研究馬克思主义，用革命斗争的实际經驗来丰富馬克思主义。他說：“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願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門科学向前推进。”“需要独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在局部方面，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二 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的革命政党而斗争

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党路线

列宁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扫除思想障碍的同时，又进行了創立党的巨大組織工作。

一八九五年秋天，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俄国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最初萌芽。一八九八年，彼得堡、莫斯科、基輔等地的“解放斗争协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还没有把党真正建立起来，党内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很盛行。

在流放期间，列宁周密地考虑并拟定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的、战斗的、革命政党的计划。列宁认为，要建立统一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就必须从思想上同经济派彻底划清界限，必须把党的建設放在馬克思主义的巩固基础上。他說：“在統一以前，并且为了統一，我們首先必須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② 因此，建党工作应当从創辦一个宣傳革命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党的机关报开始。这个报纸应当通过代办員网同各地方組織建立密切联系。他說：“沒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話。”③ 经过列宁的努力，終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出版了《火星报》。《火星报》和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培养了先进无产者忠于革命理論、对机会主义毫不調和的精神，因而“为俄国机会主义者以及西欧机会主义者所痛恨，但这是光荣的”④。《火星报》把零散的馬克思主义小组連成一气，进行了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建立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列宁同孟什維克（它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是经济派的直接继承人）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二国际的絕大多数政党，是在资本主义比較“和平”发展的时期成立的。它們的綱領沒

①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188頁。

② 《〈火星报〉編輯部声明》。《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頁。

③ 《我們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4頁。

④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409頁。



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党的组织原则服从于“合法”活动和议会斗争的需要，党内没有统一的纪律。议会党团可以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党的中央工作机关也可以实行和党中央委员会不同的路线。这些党也不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的组织实际上成为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中的不坚定分子，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地涌进第二国际的各国党中，使党内的机会主义滋长起来。这样的党，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斗，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俄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呢？在党纲问题上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党章问题上列宁同马尔托夫等人，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草案中，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的作用。这种机会主义错误遭到了列宁的坚决反对。由于列宁的坚持，党纲草案中才加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重要的条文，并在党纲草案中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后来列宁指出，这个党纲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列宁还从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观点出发，主张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党纲草案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条文都是由列宁提出的。

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一伙人，打算照抄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老办法。和这些人相反，列宁认为，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做法。一八九九年，列宁曾经指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①一九〇一年，列宁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党，这个党“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战”^②。

建党路线上的这种严重分歧，在一九〇三年七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章问题的时候，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关于党章第一条，列宁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③马尔托夫的条文虽然认为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做党员的必要条件，但主张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等人还反对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主张“自治制”，说党的地方组织可以不服从中央的决定。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没有定形的、成份复杂的、涣散的党。列宁同马尔托夫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党，必须坚持党员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坚持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这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成为两个对立的派

① 《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3页。

②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列宁全集》第5卷，第285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列宁全集》第7卷，第11页。



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后来列宁写道，“从一九〇三年起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①

在讨论党章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赞成列宁的条文。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拼命破坏大会决议，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普列汉诺夫开始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很快就变成一个十足的孟什维克。在他的帮助下，孟什维克篡夺了《火星报》编辑部的领导权，使新的《火星报》成为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在新的《火星报》上，孟什维克竭力宣传党内必须容许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团体和个人存在，必须让“每个罢工者”、每个同情党的知识分子有权自行宣布为党员。他们攻击列宁，说列宁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说什么列宁要在党内建立“农奴制”。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批判了孟什维克，同时也批判了第二国际在组织路线上的机会主义。

列宁指出，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认为组织关系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抽象的承认而已。”^② 列宁还指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到处都表现出来，导致组织的瓦解。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就是“削弱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③。孟什维克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就是否认组织在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这是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规定了为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必须遵守的基本组织原则，全面地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列宁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以便卓有成效地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能够而且应当领导工人阶级的一切其他组织。党应当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取得千百万群众的信任。党应当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应当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列宁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党，无产阶级就能所向无敌地进行斗争，并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④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这个党根本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改良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②③④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361、396、410页。



主义政党，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牢固基础上的党，是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党，是坚决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党。有了列宁领导的这个党，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就有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一个反对国际机会主义的坚强堡垒。

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保持布尔什维克的独立和纯洁

正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急忙出来为他们在俄国的同道孟什维克撑腰，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一九〇四年五月，考茨基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宣布，他赞成马尔托夫，反对列宁，并且歪曲事实，责备列宁不应该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把孟什维克“开除出”《火星报》编辑部（实际是落选）。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报纸几乎都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对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作了歪曲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向国际无产阶级说明俄国党的真实情况，揭穿机会主义者的欺骗宣传，是一项重要任务。一九〇四年八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了由列宁参加编写的报告，题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说明材料》。报告中指出，列宁提出的党章所以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惨痛教训，由于德国党章的第一条没有要求党员属于党的一个组织，就被那些捣乱分子广泛利用了。一九〇五年六月，列宁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考茨基“提供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现存关系的情况，根本不合事实”。“考茨基没有任何权利讲自己是不偏不倚的。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目前的斗争中，一贯是有所偏颇的。当然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偏颇的人最好不要过多地说自己不偏不倚，以免落个虚伪罪名。”“我们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一言：同志们！假如你们真正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兄弟党，那就不要相信所谓的不偏不倚的德国人向你们叙述的关于我们党的分裂的任何一句话。你们唯一需要的是文件，真正的文件。”^①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向外国工人的一切小组和外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党员，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

第二国际除了在宣传方面支持孟什维克外，还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了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但是决议没有说明这种统一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会后，一九〇五年二月，第二国际的执行局（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决定，成立一个以倍倍尔为首的仲裁委员会，来“调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执，求得“统一”。接受这种“仲裁”，就等于承认第二国际（实际上是德国党）有权干预俄国党的内部事务。仲裁委员会提出的“调停”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这就是要布尔什维克停止揭露孟什维克，取消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坚决拒绝了这种“仲裁”，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498、499、500页。



提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执，应当由俄国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一九〇五年六月，国际局又一次提出“仲裁”。列宁回答说，国际局的“调停”只有在两派谈判有了结果以后才能进行。

由于列宁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布尔什维克党终于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纯洁，并且使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一天天扩大。

三 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反对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

革命的爆发和策略路线的分歧

列宁在一九〇二年曾经预言：“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①果然，在一九〇五年，俄国无产阶级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进行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搏斗开始了。

促使这次革命到来的是一九〇四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这是沙皇俄国同日本为侵略中国和朝鲜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的总爆发。对于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堕落成为护国主义者，主张保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布尔什维克则相反，猛烈地抨击沙皇政府进行的侵略战争。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实行的是“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②。列宁认为，促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会削弱沙皇制度，加速革命风暴的到来。“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③

事变的发展，正是这样。战争加深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群众的斗争情绪迅速高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的军警在彼得堡屠杀和平请愿的工人，造成了几千名工人伤亡的流血惨案，这就大大激怒了劳动群众。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十月，爆发了全俄总政治罢工。在斗争中，工人群众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二月，莫斯科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同沙皇的军警进行了激烈的街垒战。在这一年，有三分之一以上县份的农民起来反对沙皇地主的统治。六月和十一月，先后发生了“波将金”号铁甲舰和其他地方水兵的起义。很多城市的驻军发生骚动。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俄国。为了直接领导俄国革命，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迫切要求各个政党表明自己的态度，制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一月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40页。

②③ 《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第32、35、34页。



九日事件以后不久，列宁就指出，当时的根本任务是武装无产阶级和农民，准备并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列宁的领导下，一九〇五年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策略。孟什维克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代表会议，也通过决议，制定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孟什维克的策略，是害怕斗争，害怕胜利，力图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支配，叛卖革命的策略。

革命的发展，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提到了首要地位。彻底批驳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全面阐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这是把俄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必要条件。于是，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列宁写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这本书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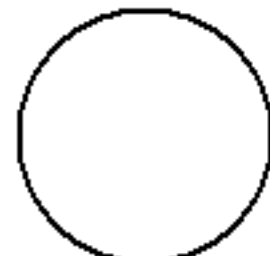
无产阶级应不应当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当这个革命的领导，而无产阶级只能作个助手，不要力求领导和独立地展开整个民主运动，以免吓退资产阶级。

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的这种荒谬论调，指出：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只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希望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一切旧制度的残余，力图防止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革命所提供的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愿意使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为彻底完成革命而奋斗。”^①不这样做，那就完全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转到和资产阶级做买卖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②。“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的、但是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③

无产阶级要保证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必须把农民当作自己可靠的同盟军。列宁指出，由于只有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

①②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36、79、5页。



的同盟軍，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給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級叛变和无产阶級失敗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①另一方面，“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級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級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級沒有足够的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級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領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东西。要防止这种危險，除了实行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别无他法的。”^②列宁批駁了孟什維克所提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发动农民就会迫使资产阶級退出革命，从而縮小革命的規模。列宁說道：“誰真正了解农民在必勝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說革命的規模会因资产阶級退出而縮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級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資格同无产阶級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規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級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規模。”^③无产阶級为了同农民結成巩固的联盟，就必须提出和实行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綱領。

怎样对待群众的暴力革命行动？

在革命中应当采取什么斗争形式，孟什維克是模稜两可的。他們說还不知道武装起义是否已經成为必要，是否已經刻不容緩，最好是爭取召集縉紳會議或国家杜馬一类的代表机关。同孟什維克的意見相反，列宁认为，人民的武装起义，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手段。民主革命运动已經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級政党应当竭力設法武装无产阶級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列宁指出，必須創立革命軍队，“革命軍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偉大的历史問題，而在現代斗争中，强力的組織就是軍事組織。”^④列宁号召“馬上在各个地方，在大学生中、特別是在工人以及其他等人中成立战斗队。讓他們立即組織三人至十人以至三十人的队伍。讓他們立即自己武装起来，誰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用左輪枪、用刀、用浸了煤油的放火布片等等武装起来。”^⑤

为了引导群众去实行起义，列宁提出了旨在发揚群众的革命首創精神、瓦解沙皇制度的政权机关的革命口号。这些口号是：举行群众政治罢工；立刻用革命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立刻組織“革命农民委员会”，用革命手段实行一切民主改革，一直到沒收地主土地为止；等等。这些口号的精神是藐視政府和現行法律，不受沙皇政府的限制，不受現行法律的限制，由群众采用无所顾忌的手段自动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在号召群众举行起义的同时，列宁反复教育群众必須拋棄立宪幻想。一九〇五年八月，沙皇政府在革命的压力下，宣布召集布里根杜馬，企图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列宁指出：在

①②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83、45、85頁。

④ 《革命軍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第528頁。

⑤ 《給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列宁全集》第9卷，第330—331頁。



当时的情况下，参加布里根杜馬，就是帮助沙皇政府欺騙人民，使人民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确定了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策略。事变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布里根杜馬流产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群众拿起武器，在十二月发动了起义。

列宁认为，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作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这个政府应该是工人和农民专政的政府，应该实行工农革命专政，其任务是巩固革命成果，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展开反对资产阶级阻碍革命前进的斗争，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

在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孟什维克认为社会民主党原则上不应当参加这个政府，而应当把政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与此相反，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原则上是可以而且应当的。这个政府应当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的纲领，并且应当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一方面要无情地打破一切反革命的企图，一方面要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参加这个政府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们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

半途而废，还是不断革命？

列宁预计，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民主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战利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必然要为争夺政权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走在所有的人前面并且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新的斗争。”^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是怎样呢？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发展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抛棄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农民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偉大同盟军的原理，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及其俄国同伴孟什维克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隔着一个漫长的停顿时期，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列宁批驳了这个观点。他指出，民主革命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②。同时，列宁又指出，要对整个民主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③。“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們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④列宁把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他说：“我们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度，无情地击溃反革命，并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⑤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

①②③⑤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12、33、44、24页。

④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9卷，第222页。



态度》这篇论文中列宁說道：“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組織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們主張不断革命。我們决不半途而廢。”^①

对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两種估計

俄国革命在十二月起义失敗后，逐漸由高漲时期轉入退潮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一九〇五年革命應該怎样評價，應該怎样来接受这次革命的經驗教訓，布尔什維克又和孟什維克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孟什維克的代表人物普列汉諾夫埋怨“不合时宜”的政治罢工，說它引起了武装起义，說什么起义失敗的情况是“不难預料”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是“游戏的冒險性”等等。列宁針鋒相对地指出：“正好相反，本来應該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應該向群众說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須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②

普列汉諾夫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同馬克思相比，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曾阻止过巴黎工人的起义。列宁指出，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經警告过法国工人，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是，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当群众已經起义了的时候，馬克思就願意同他們一起前进，同他們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訓誡他們，向他們打官腔。”^③列宁說，馬克思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的，是以实际的顧問，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現的。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仍然热情洋溢地歌頌公社的业绩，他說：“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輝的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远被銘記在工人阶级的偉大心坎里。”^④而普列汉諾夫又是怎样呢？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在俄国工人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前，並沒有发出过任何警告；当起义已經失敗了的时候，他却又嘀咕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指責革命的群众。机会主义分子普列汉諾夫怎么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馬克思相比呢？真是有天淵之別！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后，孟什維克和資產阶级自由派一起对革命橫加誣蔑。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写道：“对我国革命的估計問題决不只有理論意义，而且有最直接的现实意义。”“为了使动摇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取得教訓，为了使背叛和脱离社会主义的人感到耻辱，我們要公开声明：工人政党认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一九〇五年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偉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争的榜样应当成为我們在教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⑤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頁。

② 《莫斯科起义的教訓》。《列宁全集》第11卷，第153頁。

③ 《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书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4頁。

④ 《法兰西內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522頁。

⑤ 《談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列宁全集》第15卷，第43頁。



列宁深刻地总结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教训,指出: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根本改善群众的生活;仅仅破坏或限制沙皇政权还不够,必须把它消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必须孤立资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受到了巨大的政治锻炼,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型,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后来,列宁指出,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总演习。而在这次革命中,列宁所写的《两种策略》一书,则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基础,武装着党和工人阶级去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四 在斯图加特大会上的斗争

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以后的几年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不断地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工人群众甚至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了发展。同时,这几年接连发生侵略战争,国际关系非常紧张,军备竞赛空前加剧。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国际于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斯图加特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是列宁第一次出席的国际会议。列宁在会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自己的威信操纵会议,散布错误影响

在这次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机会主义立场,起了恶劣的作用。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党是历史最长也是当时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第二国际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可是,德国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却利用这种威信,竭力对其他党散布错误影响。各国党的许多领导人,也一味附和德国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这些人有一个特性,“非常胆小”,“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抱保留态度”^①。

德国党为了操纵大会,还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会议开始时,他们利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定,由德国党的代表担任全体会议的主席,并派出自己的重要成员来担任大会最主要的几个委员会的领导,如由修得功担任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的主席,由考茨基担任党同工会关系问题委员会的书记。大会还规定各国有不同的表决权,大国是二十票,小国只有两票。德国党一方面让党内极右翼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大卫、列金、谢德曼、福尔马尔等人出席大会;另一方面,又用尽一切办法,阻挠左派特别是卢森堡参加大会。但是,卢森堡最后还是出席了大会,不过不是作为德国党的代表,而是作为波兰党的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页。



代表参加的。

出席大会的俄国代表团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其中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有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还有工会的代表。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中，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孟什维克。

在这次大会上，右派和“中派”占了多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能依靠的力量，只有以卢森堡、马尔赫茨夫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以蔡特金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

斯图加特大会就是在国际革命派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举行的。

经过斗争，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的决议

大会讨论的最重要的也是斗争最激烈的問題，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問題。列宁亲自参加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

提交会上讨论的共有四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其他三个决议草案是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爱尔威、盖德、饶勒斯和瓦扬分别提出的。这些决议草案都具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

爱尔威的决议草案說：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所有战争都是符合资本家利益的，应当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第一，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第二，他不懂得，是不是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战争，“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第三，他“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①。列宁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

同列宁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反，福尔马尔等人借批判爱尔威的错误，宣扬机会主义观点，说什么反对战争的斗争形式是议会斗争，应当用加强对执政当局和社会輿論的影响，以制止军事冲突，而不应当用罢工来反对战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对爱尔威的批判，“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比较平静安宁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經驗”^②。列宁說，对爱尔威观点的机会主义的批判迫使人们承认，在爱尔威的思想中有一线灵活的东西，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那就是他主张群众的革命行动。虽然爱尔威的观点整个說来是“英勇的愚蠢”，但是福尔马尔等人的主张却是“机会主义的怯懦”^③。

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决议草案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战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后才能消失。可是，草案却把帝国主义战争的概念，偷换为“防

①②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3、74、75页。

③ 《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1页。



御的”和“进攻的”战争的概念，这就给护国主义者留下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隙。关于用什么行动来反对战争，这个草案和第二国际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一样，实际上只是承认议会斗争形式。

列宁召集了有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参加的会议，并和卢森堡一起对德国党的草案提出了修正，删掉了德国党的草案中有关防御战的段落，对草案最后两段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改。修改后的这两段话是：“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的帮助下，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当然，办法将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政治形势而定。”“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发生战争的话，他们应尽一切努力迅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促使资本主义统治的迅速崩溃。”

经过修改，原来的倍倍尔的决议草案面目为之一新。列宁说，“这个决议真正有了丰富的思想，并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个决议既具有正统的，也就是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用福尔马尔的眼光阅读不了这个决议，而幼稚的爱尔威思想的狭窄框子也容不下这个决议。”^① 经过列宁修正的这个决议案，在大会上一致通过。

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工会中立论

殖民地问题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又一个问题。

机会主义分子荷兰代表万一科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根本不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不去唤醒殖民地受压迫群众起来反抗殖民主义，而只是列举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殖民地可能做到的“改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建议本国政府签订国际条约，为殖民地居民规定一定的权利。这个决议草案甚至公然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② 这一提案，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得到多数机会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受到了左派的坚决反对。在大会讨论中，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企图使万一科尔的观点成为大会的意志。他们还猛烈地攻击左派，说左派不了解改良的意义，没有切实的殖民纲领等等。

列宁认为，万一科尔的观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社会主义者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

①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65页。

② 转引自《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70页。



打倒资本主义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①

经过尖锐的斗争，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团结了没有实行殖民政策或者深受殖民政策之害的小国的代表，在大会表决时争得了多数票，通过了一个较为正确的决议案。

大会还讨论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

机会主义者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交大会的决议案，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的关系，彼此不相从属。德国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会代表，他们竭力支持这个决议案。普列汉诺夫为工会中立的主张辩护，说“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在俄国是有害的”。

列宁彻底批驳了工会中立论。他指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狭小范围内，使工会同社会主义发生任何联系。工会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它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列宁根据无法反驳的客观事实说：宣传工会中立，事实上已经带来了恶果，它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张目，并使德国的工会领袖极明显地倾向了机会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和各国党的革命派一起，在会上进行了反对工会中立论的斗争。大会通过的决议，在原则上否定了工会中立论。

· 不应当把德国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

斯图加特大会上所有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都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对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列宁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② 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反对护国主义的强大武器。在这次大会上，右派和“中派”虽然占了多数，但是，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团结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终于战胜了机会主义。

会后，列宁论述了对德国党的机会主义政策所应当采取的态度。他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③。“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我们不应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通过错误的例子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④ 列宁认为，斯图加

①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3页。

②③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5、69页。

④ 《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0页。



特代表大会证实了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对德国工人运动所下的这样一段評語：“德国在平靜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就绝对需要法国人竞争的刺激，而这种竞争是不会少的。”^①

五 在革命低潮时期同修正主义者进行理論斗争

“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哲学

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的革命失敗以后，俄国轉入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宁再度出国，侨居日内瓦。革命虽然暂时失敗了，但是列宁依然对工人阶级力量满怀信心，相信新的革命必然来临。早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列宁就說：“革命被葬送了。蛆虫正在蛀蝕革命。然而，革命具有一个特点，它能在良好的土壤中很快地复活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② 列宁到日内瓦后写的第一篇論文中說：“我們在革命以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們把我們叫做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軍事进攻遭到失敗而頹丧，决不会張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結局連在一起。因此，它就不会沾染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③ 列宁在国外出版了《无产者报》，从事聚集、团结、教育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工作，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这个时期，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綫上大举进攻，有一大群时髦作家涌现出来，攻击馬克思主义，辱罵革命，贊美叛变行为。一些知識分子革命“同路人”，由消沉頹廢到蜕化变质。他們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形成了广泛的統一战綫，向馬克思主义理論基础——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討伐”。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波格丹諾夫、尤什凱維奇等人，在一九〇八年連續出版了《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唯物主义和批判的实在論》、《从現代認識論来看辯证法》、《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等书。他們企图以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义（即馬赫主义）哲学来“修正”馬克思主义哲学，把最反动的哲学观点当成了时髦的理論，康德主义、休謨主义甚至貝克莱主义都成了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哲学。他們說，“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辯证法也是神秘主义，公然宣称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神”。

① 轉引自《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9頁。

②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189頁。

③ 《政治評論》。《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2—423頁。



这些在事实上完全背棄辯证唯物主义的人，百般狡賴，不敢公开直率地反对被他們拋棄的观点。列宁說：“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①。列宁在給高尔基等人的許多信件中尖銳地指出，修正主义者的哲学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謬、有害、庸俗、說教的作品”^②。

这时，揭破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粉碎他們在哲学上的囈語，成为特別迫切的事情了。同时，革命喚起了新的阶层参加政治生活，許多新的工作人員加入了党，他們不可能一下子具有坚定的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理論斗争提到了首位。列宁說：“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訓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別說来，是把包括哲学問題在內的基本理論問題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③在这場斗争中，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論工作，写了《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这部著名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用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經驗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对当时流行的冒充馬克思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从康德出发，回到休謨和貝克莱

馬赫主义认为，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人們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列宁指出，这种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它导致荒謬的唯我論，认为只有一个高談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列宁批判了馬赫主义的不可知論，指出：物是不依賴于我們的意識、我們的感覺而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的；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决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差別，差別只存在于已經認識的东西和尚未認識的东西之間；人們認識的过程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識到比較完全比較确切的知識。認識是由許多方面和許多阶段构成的过程，其中每一单个阶段都有相对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包含有絕對真理的种子。“人类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够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絕對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給这个絕對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識的增加时而擴張、时而縮小。”^④实践是檢驗真理的标准。我們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檢驗这些映象，区别它們的真偽。把实践标准作为認識論的基础，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而把經院哲学的无数臆說一脚踢开。

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于哲学舞台的，当时德国教授中間的时

①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6、134頁。

② 《給阿·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5頁。

③ 《我們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59頁。



髦口号是：“回到康德那里去！”經驗批判主义的这两个創始人在哲学上的“发展”正是从康德那里出发的。馬赫写道：“我应当万分感激地承认，正是他的（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作了我的全部批判思維的出发点。但是我沒有能够始終忠实于它。我很快又回到貝克萊的观点上来了”，后来“又得出了和休謨的观点相近的观点”。馬赫主义的信徒們波格丹諾夫之流沒有他們的老师坦率，他們一方面坚决地脫离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又顛倒是非，閃爍其詞，硬說他們在哲学上“也”是馬克思主义者，硬說他們和馬克思“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稍微“补充了”馬克思的学說。

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能否否定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嗎？

馬赫主义者吹噓他們的哲学是“二十世紀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其实，他們不过是同自然科学中的一个落后的流派相联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这就动摇了傳統物理学的一些陈旧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不懂得辯证法，經過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于电子的发现，他們就說什么“物质消失了”，存在着“沒有物质的运动”，科学原理不过是一些“符号”和“記号”等等。馬赫主义者同他們站在一起，利用这些荒謬的論断来否定哲学唯物主义。列宁指出，消失的是我們認識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而不是物质本身。傳統物理学所认定的一些物质的“絕對”特性，現在被证明是相对的。但物质是在我們意識之外的客观实在，这是絕對的。無論是电子的发现或者其他什么新的发现，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必然走向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辯证唯物主义，但是，它所經歷的道路是曲折的。列宁写道：“現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辯证唯物主义。分娩是苦痛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廢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經驗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經驗符号論、經驗一元論等等，都是这一类廢物。”^①

判断一个人、一个哲学派别，不能根据他們自己挂的招牌

馬赫主义企图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妄想成为无党派的哲学。列宁說，“在一切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条紅綫那样貫穿着‘駕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們之間‘陈旧的’对立的愚蠢願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終不渝的斗争。”^②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謊言和糊塗观点，其他的路綫是沒有的。所謂哲学上的无党派性，只是可耻地掩飾着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奴

①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30、360—361頁。



顏婢膝而已。哲学是一門有党性的科学，資產階級哲学教授們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學問的帮办。在馬赫主义的認識論的抽象議論后面，隐藏着階級斗争和階級思想。馬赫主义者的客观作用，就是效劳于反动势力。列宁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終都是有党性的，他們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棄以及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① 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現着現代社会中敌对階級的傾向和思想体系”^②。

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都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列宁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者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們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們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論問題、他們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們过去和現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隨者。

根据这个标准，列宁对經驗批判主义作了概括的評價：第一，这种哲学用新的謬論、术语和詭計来掩飾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旧錯誤，它在全部認識論問題上是反动透頂的。第二，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們並沒有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謨和貝克莱。他們的哲学只不过是无数資產階級哲学中的一个流派，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路綫。第三，这种哲学与現代自然科学的一个学派即反动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相联系。第四，这种哲学也是有党性的，它的客观的、階級的作用是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們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階級偉大革命斗争的序幕

一九〇八年四月，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列宁写的《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发表了。在这篇著名的論文中，列宁說明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系統地揭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内容和实质，指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无产階級爭取解放斗争的意义。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者敌視馬克思主义，他們在哲学、政治經济学、階級斗争学說等方面全面地篡改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者跟在資產階級教授的屁股后面跑，胡說唯物主义早已被駁倒了，并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靜的）进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辯证法。

在政治經济学方面，修正主义者竭力用“經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攻击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論、关于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理論和資本主义必然崩潰的理論，宣傳階級矛盾有緩和下去的趋势。列宁坚决駁斥了这种謬論，他說，修正主义者用片面的事实，代替普遍的現象，而不把这些事实和整个資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內，只有最近視的人，

①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8、379頁。



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统一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①。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者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胡说在民主制度下，“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因此不能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列宁认为，这种观点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是一致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②

列宁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修正主义政策的实质：“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相辅相成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③

列宁极高地估计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理论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偉大意义。他说：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斗争，将来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偉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④

六 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反动派对革命运动的迫害大大加强了，同时，在农村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富农经济发展的改革。革命运动陷于低潮。但是，列宁指出，由于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解决，一九〇五年革命所由产生的深刻原因并没有消失，它们会推动群众重新进行革命斗争，因而新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规定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目标仍然是推翻沙

①②③④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18、19、21页。



皇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列宁指出，在反动统治加强的条件下，不可能立即举行总政治罢工或武装起义，必须用迂迴手段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必须采用防守的策略，即更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聚集力量，从而准备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以进攻的策略代替防守的策略。列宁指出，党必须“竭力有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帮助无产阶级集合和团结起来，学习斗争的本领，伸展自己的手脚，——同时要不屈不挠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党的组织，首先和主要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指导合法组织中的一切工作，才能使这些工作具有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①。为了实行有秩序的退却，重新积蓄革命力量，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必须一方面反对崇拜资产阶级合法性、主张取消党的取消派，一方面反对拒绝利用合法机会的召回派。

取消派崇拜资产阶级的合法性

孟什维克被反革命的暴力所吓倒，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了取消派，提出了建立“公开的工人党”或者“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他们企图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形的团体，并且主张这种团体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地位。列宁指出，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然而，取消主义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把党引上了资产阶级的错误的道路，引上了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背弃自己的党，也不取消它。取消主义则是走到了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②取消派为了实现这种投降政策，采取了分裂党的行动，他们脱离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群众集会上反对党。列宁在《几个争论问题》一文中说，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里面除了改良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③。取消主义“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④。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派成为取消派，在当时俄国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作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

① 《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7—258页。

②③④ 《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7—138、148、142页。



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①

在对待合法活动的界限上，列宁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界限。他说：“我们希望巩固能够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公开活动的机会的社会民主党，取消派则希望在斯托雷平的统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范围內。我们争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斯托雷平的专制制度，为此而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这一活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则争取使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统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②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

“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和随风转舵的托洛茨基

列宁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还反对了以波格丹诺夫等人代表的“左”倾空谈家——召回派。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三届杜马，是反动透顶的、黑帮一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召回派要求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们还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认为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的机会，无论如何要进行秘密活动。

列宁指出，由于处在革命低潮时期，因而不存在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宣传社会主义。为了准备革命而利用议会讲坛，这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所产生的必要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想替农奴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每个活动“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③ 召回派拒绝利用合法机会进行革命活动，就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在秘密组织里闭关自守，使秘密组织失去利用合法掩护的机会。他们事实上拒绝党去领导广大非党群众，妨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把召回派称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认为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一九〇九年六月，召回派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

列宁后来在谈及反对召回派的斗争时说道：“在所有被击破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他们的骨干保护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

① 《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3页。

②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6卷，第85页。

③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第409页。



小(就其分裂的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穿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到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的工作。”①

当时,托洛茨基完全采取了取消主义的立场。他宣称:“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②列宁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中指出,“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论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党的导言。”③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二年間,组织了八月联盟,联合了取消派、召回派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别,来反对列宁。但他又标榜“非派别性”,说什么“所有的派别都在采用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并且污蔑列宁“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就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④托洛茨基这种自欺欺人、装腔作势的叫喊,不过是公然替取消派辩护。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一贯随风转舵、左右摇摆的不光采的历史。托洛茨基忽而是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忽而又主张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昨天同“经济派”合作,今天又同取消派结成联盟。他自命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今天‘借用’这一派别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⑤,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⑥。

同取消派是不能统一的

第二国际一贯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宁要反对俄国党内的取消主义,必须同支持取消主义的第二国际作斗争。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又一次讨论俄国党的统一问题。在会议上,曾经提出两个计划:一个是卢森堡提出的,她采取了调和态度,要求无原则地恢复所谓党的统一。列宁批评了卢森堡的错误。另一个计划是考茨基提出的,他主张“安排共同交换意见”。国际局就考茨基的提案通过了决议。列宁对国际局的这个决议,表示可以接受,同时指出了考茨基在会上发言说俄国党“已经消失”的错误。列宁指出,“必须把已经成为国际局决议的考茨基的决议案和他的发言分开来看”,这是“好决议和坏发言”⑦。

一九一四年七月,由国际局主持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个恢复俄国党的“统一”的会议。参加会的除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外,还有一些其他派别集团。会议本来只是为了交换意见,但是在考茨基的把持下,却通过了一个恢复“统一”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拒绝参加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页。

②④ 转引自《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42、344页。

③⑤⑥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42—343、346、326页。

⑦ 《好决议和坏发言》。《列宁全集》第19卷,第530、529页。



这一決議案的表决。列宁认为，同取消派沒有任何妥协余地。“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棄它的人，那它就会不能生存。”^①“只有同取消派完全决裂并彻底克服这种离开社会主义的資产階級傾向，才能實現党內的真正統一”^②。

七 哥本哈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

反对合作社問題上的改良主义

一九一〇年八月，第二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另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团结左派，爭取通过了一些基本上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的決議。

列宁亲自参加了关于合作社問題的委员会，在这个問題上，同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这个期間，資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有了較為广泛的发展，工人参加合作社已經比較普遍。在这个問題上，机会主义观点已經相当流行，它认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大会对于合作社問題的討論，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会开幕以前，公布了三个关于合作社的決議草案。一个是比利时党提出的，一个是法国党少数派盖得提出的，一个是法国党多数派饶勒斯提出的。

列宁分析了这三个草案，指出这里反映了两条主要路綫：“一条是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路綫，承认合作社对这个斗争的意义，认为它是进行这个斗争的工具，是进行这种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并且确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这种作用而不会成为純粹的商业企业。另一条是小資产階級的路綫。它模糊了合作社在无产階級階級斗争中的作用問題，脱离这个斗争来談合作社的意义（即把无产階級和业主对合作社的看法混为一談），用籠統的詞句規定合作社的目的，这些籠統的詞句連資产階級改良主义者即进步业主和小业主的思想家都是可以接受的。”^③

饶勒斯就是代表后一条路綫而反对无产階級路綫的。列宁坚决反对饶勒斯的主張，并且先后提出了自己的決議草案和对小組委员会起草的決議草案的修正案，但是都沒有通过。为了避免局部性問題的爭論，列宁在大会上贊同了小組委员会的草案。由于革命派的坚持，草案中包括了这样一段話：“合作运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但是它仍然是階級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工人階級通过階級斗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即夺取政权和經濟上的权利并實現所有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的公有化。”这个草案成为大会一致通过的決議。

哥本哈根大会还通过了反对軍国主义和战争的決議，这是鉴于斯图加特大会以后的三年

① 《几个爭論問題》，《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7頁。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會議》，《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3頁。

③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問題的討論》，《列宁全集》第16卷，第275頁。



間，各国軍备竞赛有增无已，战争危机日益加剧而作出的。決議包含了斯图加特大会关于軍国主义問題的決議的基本論点，特別是經過列宁修改的那一部分。決議还指出，“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彻底消除。”“各国有組織的社会主义无产階級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机会主义分子虽然在表面上也投票贊成这个決議，实际上，他們已經一天走上公开的沙文主义的道路了。

在战争問題上机会主义者暴露了叛徒面目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国际形势更加緊張了。一九一一年，法国和德国为了爭夺摩洛哥几乎发生了战争。同年，爆发了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战争。一九一五年，又爆发了巴尔干战争。这些事实表明，更大規模的战争正在酝酿着。

这种局势，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明确表示态度。机会主义者在这一重大問題上开始暴露了他們的嘴臉。他們支持資產階級政府的扩軍备战政策，向群众散布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

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會議，竟然通过了贊成政府扩充海軍的決議。決議中写道：“代表會議現在认为最近的目的就是維持足够的海軍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意大利社会党的右傾改良派比索拉蒂等，公然支持資產階級政府同土耳其的战争。瑞士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分子爱利斯曼等人，投票贊助政府阻止工人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巴登議會党团，投票贊成資產階級政府的預算。德国工会領袖列金訪問了美国，十分羡慕美国的資產階級民主，羡慕每个議員能够得到全套最新設備的专用房間并配备由国家发給薪水的秘书等等。他还向美国国会发表了討好資產階級的“祝賀演說”。

列宁尖銳地批判了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公然背叛工人階級的行为。他指出，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竟然追隨資產階級政府的战争政策，主張增加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海軍，这就說明他們轉到沙文主义方面去了。列宁非常贊同意大利社会党把比索拉蒂等开除出党，认为这样做完全正确。关于爱利斯曼等人，列宁写道，这些人“决不是通常投到敌人方面去的普通逃兵，他們不过是平庸的市民，是滿腦子立宪民主幻想的、习惯于議会的‘鸡毛蒜皮’的机会主义者。階級斗争的紧急关头到来了，……这些庸夫俗子就張皇失措，滾到泥潭里去了。”^①列宁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應該摹仿的》一文中写道：列金的活动表明，“美国資產階級的手法是‘用溫柔的方法杀害’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德国机会主义的手法是用拒絕社会主义来討好‘溫柔’可爱的民主資產階級。”“我們不應該用‘表面乐观的’詞句来掩盖和混淆在这种現象中暴露出来的德国政党明显的病态，而應該在俄国工人面前把它揭示出来，以便从历史比較长的运动的經驗中学习，学习有哪些东西是不應該摹仿的。”^②

① 《在瑞士》。《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0頁。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0、253頁。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文献——巴塞尔宣言

巴尔干战争爆发以后，劳动群众反战情绪更加高涨，欧洲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巴尔干战争和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第二国际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历时两天，欧洲各社会党都有代表参加。会上只讨论了反对战争威胁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即有名的巴塞尔宣言。

宣言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和哥本哈根大会有关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来反对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利用它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宣言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战争将造成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各国王朝的野心而互相厮杀的犯罪行为。宣言向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提出警告：“让各国政府永久记住，在目前的欧洲局势和工人的激愤情绪下，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恶魔纵放出来，它们本身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让它们想一想，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列宁很重视巴塞尔宣言，认为宣言“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巴塞尔宣言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①。

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在会上公开反对这个宣言，主要是迫于群众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情绪的压力。

巴塞尔大会以后，在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继续高涨的压力下，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党的代表大会，都分别通过了反对战争威胁的决议或者表示反对军备竞赛。一九一四年六月至七月，当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时，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群众都举行了示威游行或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集会。

但是，各国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只是空喊和平，或者用和平主义的纲领来限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竭力给群众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德国反动政府在为和平而奔走。这个党的机关报竟把德皇说成是人类和平的忠诚倡导者。他们又秘密地同政府勾结，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将支持政府。他们并企图把引起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冲突的全部责任推给俄国。法国社会党和其他社会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包括俄国的孟什维克在内，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反对德国。这样，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实际上背叛了巴塞尔宣言的基本原则，帮助了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使帝国主义得以更无顾忌地进行战争。

（未完待续）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4、186页。

